



湖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宫崎滔天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

学 科 专 业	世界史
学 位 类 型	历史学硕士学位
研 究 生 姓 名	熊心梅
导师姓名、职称	易兰副教授
论 文 编 号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二一年六月

分 类 号 _____

密级 _____

学校代码 10542

学号 201820050481

宫崎滔天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

Miyazaki Toten and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Asianism

研 究 生 姓 名 熊心梅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易兰副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世界史

研 究 方 向 史学史及史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二一年六月

摘要

在复杂多变的亚洲主义思潮中，宫崎滔天是极其特异的存在。他的亚洲主义学说不仅是对早期朴素型“亚细亚连带论”的一种延伸，更是建立在亚洲各民族利益共同体上的崇高理想。在践行其亚洲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中，宫崎滔天也始终坚守着“亚洲连带”的真诚心愿，以赤诚之心与中国革命同行。直到今天，作为一个积极且有意义的行动参照，探讨宫崎滔天及其亚洲主义思想对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仍然大有裨益。

本文以亚洲主义发展流变中宫崎滔天的思想及行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主义与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依据时间顺序梳理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形成、成熟及调整的演进轨迹，阐释在此过程中其亚洲连带行动的成果与挫折，凸显宫崎滔天思想与行动的独特性，从而揭示宫崎滔天在亚洲主义流变中的地位与作用。

受早期亚细亚连带论的影响，宫崎滔天提出以中国提携亚洲的“支那革命主义”学说，初步建构起其亚洲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其思想的核心要素源于自由民权式家庭及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这些经历赋予了宫崎滔天亚洲主义与众不同的底色。甲午战后亚洲主义由“连带”转向“侵略”之时，宫崎滔天依然固守在“亚细亚连带”的思想阵营，为推行其“支那革命主义”理念展开了相关的革命实践。在同中国革命的安危与共中，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成熟。一战后亚洲主义彻底陷入侵略与扩张的狭路之时，宫崎

滔天的“亚洲连带行动”思想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在理想与现实的背道而驰下，宫崎滔天开始对其亚洲主义思想进行调整，由过去激进浪漫的“支那革命主义”转为保守温和的“对日改造观”，并在对亚洲主义的脱离与复归中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流变，支那革命主义，对日改造观

ABSTRACT

In the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world of Asianism, Miyazaki is an extraordinary presence. His theory of Asianism is not only an extension of the early naive "Asian joint theory", but also a lofty ideal based on the interests community of all Asian nations. In the concrete actions of practicing his Asianism, Miyazaki also always sticks to the sincere wish of "Asian association", and walks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his sincere heart. To this day, as a positive and meaningful action reference, discussing Miyazaki and his Asianism thoughts is still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friendly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is paper takes Miyazaki's thoughts and ac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sianis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positivism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is paper combs the evolution track of the formation, maturity and adjustment of Miyazaki's Asianism, explains the achievements and setbacks of Miyazaki's Asian joint action in this process, and highlights the uniqueness of Miyazaki's thoughts and ac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ism. It reveals Miyazaki's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Asianism.

Influenced by the early Asia joint theory, Miyazaki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ary revolution" with China leading Asia, and initially constructed the core content of his Asianism thought. But the central elements of his thinking were his liberal family and Christian faith,

experiences that gave Miyazaki's towering Asianism a distinctive undertone. When the Asianism turned from "joint" to "aggression"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Miyazaki still stuck to the ideological camp of "Asian joint" and carried out relevant revolutionary practices to promote his "revolutionary revolutionary" idea. In the process of sharing with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iyazaki's towering Asianism thought also tended to mature. When Asianism fell into the narrow path of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after World War I, Miyazaki's towering thought of "Asian joint action"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difficulties. Under the opposite of ideal and reality, Miyazaki's thought experienced setbacks and adjustments, from the past radical and romantic "revolutionary revolution" to the conservative and moderate "view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and in the separation from and return to the Asianism 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Keywords: Miyazaki Toten, Asianism, change and development, Revolutionary doctrine, Transformation view of Japan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I
绪论.....	1
一、 选题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	1
三、 创新之处.....	15
第一章 早期亚洲主义与宫崎滔天思想的形成.....	17
第一节 “亚细亚连带论”的提出及发展.....	17
一、 幕府末期“联亚抗欧”意识的觉醒.....	17
二、 兴亚会与“日清提携论”.....	19
第二节 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	22
一、 家庭及基督教的影响.....	22
二、“支那革命主义”思想的启蒙.....	25
三、“支那革命主义”思想的确立.....	26
第三节 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尝试.....	28
第二章 亚洲主义的异变与宫崎滔天思想的成熟.....	31
第一节 甲午战后“亚洲侵略思想”的抬头.....	31
一、“东洋盟主论”的鼓吹及推行.....	31
二、东亚同文会与“支那保全论”.....	33
第二节 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成熟.....	35
一、反政府反侵略的鲜明立场.....	36

二、从“支那”到“世界”的革命构想.....	37
第三节 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展开.....	41
第三章 亚洲主义的狭路与宫崎滔天思想的调整.....	46
第一节 一战后“亚洲侵略思想”的强化.....	46
一、“大亚洲主义”的出台及实施.....	46
二、黑龙会与国权扩张运动.....	48
第二节 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困境.....	50
第三节 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调整.....	53
一、“对日改造观”的萌发及主要内容.....	53
二、对亚洲主义的脱离与复归.....	57
结语.....	62
参考文献.....	64
附录.....	69
致谢.....	71

绪论

宫崎寅藏（みやざきとうてん）又名宫崎滔天（1871—1922），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因改别号为白浪滔天，故世人常以此为称，书其为“宫崎滔天”或“滔天”。在复杂多变的“亚细亚之流”中，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学说虽始终处于弱势和旁流地位，但其对“亚洲连带”的赤诚之心却让他成为了亚洲主义群体中独树一帜的存在。在亚洲主义急遽右转之际，宫崎滔天仍然保持着对中国革命的满腔热忱，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贡献了巨大力量。而倾尽毕生心血扶持革命的宫崎滔天也与革命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中日交往史上成就了一段佳话。可以说，宫崎滔天的学说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亚细亚连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研究现状

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必然提及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演变。事实上，围绕宫崎滔天的思想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思潮的整体性研究，另一类则是关于宫崎滔天及其亚洲主义思想的具体研究。是故，在对宫崎滔天展开具体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作一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亚洲主义思潮的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对亚洲主义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日本学界。战后初期，围绕战败和本国的独立与民主问题，日本学界开始重新对“近代的超克”等思想史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此为契机，同样作为日本思想史重要遗产的亚洲主义也被纳入了讨论范畴，亚洲主义的相关研究就此起步并在此后取得了长足发展。大体来说，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宏观层面出发的概念分析和微观层面出发的史实讨论。

1、国外研究现状

著名学者葛兆光指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竹内好一派就开始对亚洲主义进行集中讨论，由此掀起了日本学界对亚洲主义的研究热潮。进入 90 年代后，新一轮讨论似乎又在日本兴起。^①

战后初期，围绕亚洲主义的相关问题，日本学界展开了大量实证性研究。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围绕其定义、阶段和内涵进行讨论，并试图通过一些学理性的分析明确亚洲主义的相关概念。1960 年，东京学派代表人物野原四郎首次对亚洲主义的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②野原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定义为“以日本为轴心连带亚洲抗衡西欧的主张”，并将其划分为带有进步意义的“亚细亚连带论”和富含侵略意义的“大亚洲主义”两大主要流派。野原认为，亚洲主义最初是以抵御西方列强，激发亚洲团结的“亚细亚连带论”为主，后伴随着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的确立，亚洲主义异变为明治政府实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的理论工具，“大亚洲主义”由此诞生。自野原后，日本学界便掀起了对亚洲主义的进一步讨论，^③比较引人瞩目的是竹内一派对此的分析。竹内在《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亚洲主义》中指出，^④将亚洲主义区别为两大对立流派的做法有些太过机械死板。因为，亚洲主义中的“连带”和“侵略”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不可分离关系。对此，竹内从“非重合”的角度对亚洲主义下了一个复杂定义，并将其特征概括为“千差万别就是亚细亚主义”。在野原和竹内的影响之下，时至今日，认为亚洲主义虽种类丰富、千差万别，但仍可大致划分为健全的“亚洲连带论”与侵略的“大亚洲主义”两大流派，这样一种解释依然在学界占据着主流地位。^⑤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及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呼声高涨。在这一潮流的启发下，日本学者再度围绕亚洲主义展开了全面讨论。这一时期，学者们从具象层面出发进一步对亚洲主义的内

^① 葛兆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中华书局，2011：126.

^② 野原四郎. アジア历史事典[M]. 東京：平凡社，1971.

^③ 参见：三輪公忠. アジア主義の歴史考察——日本文化の変容[M]. 東京：講談社，1973；本山幸彦. 明治前半期におけるアジア観の諸相[J]. 人文学報 1970（3）；衫浦明平. 江戸末期知識人のアジア観[J]. 群像，1972（12）.

^④ 竹内好. 現代日本思想大系・亜細亜主義[M]. 東京：筑摩書房，1970.

^⑤ 刘峰.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4）：53—59.

在逻辑及其中包含的历史事实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狭间直树的系列论文《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就是此类研究的范本。狭间以阶段分析法对亚洲主义的团体、人物及其相关理论展开了具体考察，提出了亚洲主义的三大阶段和两个具体内涵。狭间认为，从1880年到1945年战败，亚洲主义六十五年的历史可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①而1895年甲午战争的战败便是亚洲主义发生异变的起点，此后亚洲主义从主张平等提携的“亚细亚连带”转变为寻求对外扩张的“亚洲侵略”理论。^②伴随狭间一派对亚洲主义源流、嬗变及衰落的相关讨论，亚洲主义的实证研究就此迈入了更为具体的层面并开始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这一时期，小路田泰直、古屋哲夫、荒野泰典、冈本幸治、嵯峨隆等学者也从阶段分析法出发，以各时期的代表人物为线索对亚洲主义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③归纳上述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亚洲主义经历了“连带”向“侵略”的历史演变，而甲午战争就是其异变的转折点。若在此二阶段下对亚洲主义的历史演变作更为细致的划分，“亚洲连带论”又可分为曾根俊虎的“日清提携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和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等具体内容。上述理论虽在实现亚洲连带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联合亚洲，抵抗欧美”的目的是一致的。同样，“亚洲侵略论”其下也富含“日支保全论”、“东洋盟主论”、“大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具体内容。这一倾向下的亚洲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将侵略矛头直指亚洲内部，成为了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理论工具。但随着论述的展开，日本学者对亚洲主义“变异”的关心却比较稀薄，并时常通过暧昧的文字表达模糊亚洲主义的边界，表现出超历史的个人情感关怀。

^① 具体划分如下：早期亚洲主义以1880年振亚社的成立至1895年甲午战争的爆发，这一时期的国家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基本对等。从中期到晚期的推移，以1895年至1928年第二次山东出兵为节点。这一时期的亚洲关系变为在列强协调框架下，以日本优势为轴心。第三阶段即晚期为1928年至日本战败，这一阶段的亚洲主义表现为将日本推向顶峰，一味追求日本一国的利益。从这一点来说，亚洲主义这时已经丧失其本质了。

^② 狭间直树. 初期主義史の考察（1）[J]. 東亜, 2001（8）.

^③ 参见著作：小路田泰直. 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義と日本主義の相克[M]. 東京：柏書房，1997；古屋哲夫. 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M]. 東京：緑蔭書房，1996；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 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M].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後藤乾一. 20世紀日本のアジア関係重要研究資料[M]. 東京：龍溪書舎，2008；村田雄二郎. 共和の夢膨張の野望1894-1924[M]. 東京：岩波書店，2016；嵯峨隆. アジア主義と近代日中の思想的交錯[M]. 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16；嵯峨隆. アジア主義全史[M]. 東京：筑摩書房，2020.

2、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日本学界对亚洲主义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在这一方面虽起步较晚，但仍取得了显著成果。大体来说，国内学者对亚洲主义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从整体性出发的综合研究和选取其中某一阶段、某一流派为主要对象的个性研究。

首先，是关于亚洲主义的综合性研究。王屏于本世纪初编成的《近代日本亚细亚主义》一书是我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也被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太一郎誉为“中国新生代学者率先参与创新‘亚洲主义’的先兆”。^①通过思想史与国际政治结合的新方法，本书从全新的角度对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相关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亚洲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论。王屏认为，以第一个亚洲主义团体振亚社的成立到东亚同文会，此为亚洲主义的第一阶段，代表理论为“亚细亚连带论”；从日俄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末为亚洲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代表理论为侵略型的“大亚洲主义”，此后直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亚洲主义的第三阶段，代表理论为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②同时，王屏亦提到，最初的亚洲平等联合主张是在甲午战争后基本消失或已不占主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这一时期‘日支保全论’的提出。^③

其次，是从亚洲主义中选取其某一阶段、某一流派为主要对象的个性研究。譬如，本世纪初盛邦和、戚其章等人围绕早期亚洲主义相关问题的讨论。^④盛邦和认为，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初期产生的亚洲主义为早期亚洲主义，它包含主张亚洲联合的“亚洲同盟”、“日中联合”等积极论调，也包含“亚洲责任论”和“亚洲盟主论”等消极思想。^⑤但早期亚洲主义最后还是演变成了与“大陆政策”相关的侵略主义，而甲午战争就是亚洲主义异变的转折点。不过，戚其章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认为并没有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更不存在亚洲主义“变

^①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0.

^②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

^④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 历史研究，2005（3）；戚其章：日本大亚洲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J]. 历史研究，2004（3）.

^⑤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 历史研究，2005（3）：135.

质”一说。^①戚其章还指出，亚洲主义从始至终都与“大陆政策”有关，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它的起点。戚、盛二人围绕亚洲主义的商榷在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其中盛文关于“早期亚洲主义”的论证和“以甲午战争作为亚洲主义分界线”的见解获得了大部分学者支持。

此外，杨栋梁、葛兆光、韩东育、刘峰等学者也围绕亚洲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②归纳上述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在近代化取得成功背景下产生的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兴亚主义”。在“兴亚”的启发下日本试图重构与亚洲的“连带”关系，但在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又演化为了“凌驾与侵略”亚洲。^③2、自甲午战争后，日本一直在不断强化自己的盟主意识并最终演化为侵略亚洲的实态。3、尽管亚洲主义被划分为“连带”与“侵略”两个对立流派，但在亚洲主义的人物或群体之间，还大量存在着游离于二者之间的“边缘人”和“边缘群体”。

综上，中外学者围绕亚洲主义这一理论进行了充分的历史性分析和现实性研究。虽在具体的阶段划分和人员定性上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些研究结论仍就以下内容达成了基本共识。即以甲午战争为界，亚洲主义可划分为主张团结亚洲的“连带论”和对抗亚洲的“侵略论”。在此二阶段下，其具体内涵又历经了早期“提携攘夷论”到晚期“大东亚共荣圈”的一路右倾下滑，致使亚洲主义最终沦为了日本实现扩张侵略的理论工具。不过，于本研究而言，因为是从个案角度观察亚洲主义，研究年份将止于20世纪20年代，并不涉及亚洲主义后半段（即右翼团体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相关内容。故据上述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亚洲主义在思想内涵上主要经历了“日清提携”——“日支保全”——“大亚细亚主义”的发展演变，而甲午战争是其从“连带”走向“侵略”的转折。在具体论述中将

^① 杨栋梁 王美平.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J]. 日本学刊, 2009(3): 12.

^② 杨栋梁 王美平.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J]. 日本学刊, 2009(3); 刘峰.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6(4); 潘吉玲. 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和伦理[J]. 日本研究, 2005(4); 葛兆光. 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3); 韩东育. 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 (1592-1945)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4); 王向远. 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J]. 华侨大学学报, 2005(2); 刘峰. 一九一〇年代後半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展開[J]. 千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2(5).

^③ 葛兆光. 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3): 22.

以此亚洲主义的发展流变为线索,进一步考察处于该历史潮流中宫崎滔天的思想变化。

(二) 宫崎滔天及其亚洲主义思想的相关研究

宫崎滔天作为亚洲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国内外的相关论著自是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二战以来,中日两国的学者以不同视角对宫崎滔天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对滔天革命实践的史实性介绍和思想流变的批判性分析两个方面。是故,本文将以此为依据对宫崎滔天展开相关的学术史回顾。

1、国外研究现状

自狭间直树全面开启亚洲主义的实证性研究以来,典型代表人物宫崎滔天成为了该研究下的主要分析对象。作为一个积极且有意义的行动参照,重提宫崎滔天也意味着“亚细亚连带论”在此时更具有了现实意义。因此,与宫崎滔天相关的史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大体而言,国外方面关于宫崎滔天的研究主要是以史实介绍和思想分析两方面为主。

首先,关于宫崎滔天的史实性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滔天的一生作全貌性观察,对其丰富的人生经历展开论述;二是选取滔天人生的某一时期,对该阶段的行动作具体分析。关于前者的研究多出自上个世纪中期,因其涉及大量历史事实的论述,故多以个人传记的形式出现。这些传对滔天的人生经历进行了客观阐释,重视从事实层面介绍其思想和行动。譬如渡边京二、上村希美雄、高野澄、榎本泰子等人的作品。^①其中,这些著作以渡边京二的《宫崎滔天评传》反响最为热烈。^②该书通过追溯滔天的生平和言论,勾画了作为革命运动家、浪曲家、著述家的滔天形象,展示了在理想与现实这个二律背反世界中滔天复杂、

^① 渡边京二. 評伝宮崎滔天[M]. 東京: 大和書房, 1976; 上村希美雄. 宮崎兄弟伝[M]. 東京: 葦書房, 1984; 榎本泰子. 宮崎滔天[M]. 東京: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3; 榎本泰子. 宮崎滔天: 万国共和の極楽をこの世に[M]. 東京: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3; 初瀬竜平. アジア主義と国際システム——宮崎滔天の場合, 日本近代化を問う[M]. 東京: 勁草書房, 1982; 武田清子. アジア主義における孫文滔天, 正統と異端の間——日本思想史試論[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7. 山本博昭. 宮崎滔天伝 人生これ一場の夢[M]. 東京: 書肆侃侃房, 2018.

^② 渡边京二. 評伝宮崎滔天[M]. 東京: 大和書房, 1976.

辗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

在大量相关著作涌现以后,有关滔天的实证性研究也进入了更为具体的阶段分析。这些论著大多围绕滔天革命生涯中某个时段或事件进行相关探讨,又因滔天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密切关系,是故该方向下的研究多以“滔天与中国革命党人”或“滔天与中国革命”为题。譬如,日本学者卫藤沈吉重点分析了宫崎滔天献身革命的原因,指出基督教中的“人类同胞”和“世界主义”是促发滔天行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滔天的革命行动是一种建立在亚洲连带意识上的自发行为。^①久保田文次就滔天与革命派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为切入点,通过二者对义和团运动评价的一致性指出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在思想上有着很强的共通性,尤其是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日合作提携及亚洲各民族独立等问题上都存在极为相似的见解。^②容应莫则从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群体的全貌出发,通过分析他们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原因,以此凸显了宫崎滔天在其中的独特性。容应莫指出,明治日本的青年人大多都是以实现国权扩张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者,而只有宫崎滔天是从人类同胞的世界主义立场出发主动援助中国。^③此外,欧美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围绕“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等主题展开了研究,但大都是研究也是基于史实的阐述,并未深入到思想分析的领域。^④总之,上述文章围绕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或革命党人的关系展开了史实论述,并对宫崎滔天的中国认识及其献身于中国革命的原因进行了重点分析。但是,以上叙述并未进一步探讨宫崎滔天的行动与其亚洲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只是基于基本史实的论述,从叙述层次上来看比较单一。

除围绕“滔天与中国革命”的一般性视角展开研究外,日本方面关于宫崎滔天的史实性研究还有几个特别的关注点。例如,学者太田雅夫以宫崎滔天创办的

^① 衛藤沈吉.滔天と清国革命はどうして結びついたか[J].思想,1968(2).

^② 久田保文次.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J].山东社会科学,1991(1).

^③ 容應莫.明治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なぜ明治人は活躍の舞台を中国大陆に求めたか[J].アジア研究所紀要,1994(21).

^④ 列举几篇: Danile Leese."Revolution":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J].*Oriens Extremus*,2012(51):25-61; W. Puck Brecher.Eccentricity as Ideology: Biographies of Meiji "Kijin"[J].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10(10):213-237;Rebecca E. Karl.Creating Asia: China in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8(10):1096-1118;Masaru Ikei.Japan'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6(25):212-227; C hih-yu Shih.A Rising Unknown: Rediscovering China in Japan's East Asia[J]. *China Review*,2011(11):1-26.

“革命评论”这一刊物为切入点，通过论述《革命评论》的创刊经历及其中的重要文章，展示了这一时期滔天对世界革命浪潮的反思与展望。^①北川纯子则对作为浪曲表演家的宫崎滔天进行了讨论。围绕滔天编写的浪花曲剧本“明治国舅爷”，北川对其政治失意后的思想变化进行了详细论述，展示了在逆境中艰难前行的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形象。^②另外，武田清子以宫崎滔天与基督教为题，阐释了基督教中“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理念对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本文中，武田还特别指出，基督教是连接孙文和滔天思想的内在契机。正是因为滔天基督教式的人类观、社会观、世界观的无意识公开才使他与孙文有了深交的契机，并在之后全力支持中国革命事业。^③以上研究通过追溯滔天在不同时期的形象展现了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同时也进一步探讨了上述经历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但此类研究重在依据时间顺序阐释宫崎滔天的思想，而忽视了进一步分析滔天思想的变化与发展，对于深入理解宫崎滔天及其思想而言有所不足。

其次，关于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将宫崎滔天置于亚细亚之流中，以日本内政和国际秩序的变化追溯其亚洲主义思想。其中，较早的有初濑龙平的《亚洲主义与国际体制——以宫崎滔天为例》。^④初濑指出，宫崎滔天是具有代表性的亚洲连带论者。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提倡“亚细亚连带论”并提出了以中国为革命中心的“支那革命主义”。但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滔天的这种连带思想只能以隐晦的形式表达，转向了更为保守、和平的“对日改造观”。近藤秀树在《明治侠气与昭和疯狂——革命和反革命》^⑤一文中以比较研究的方法，介绍了宫崎滔天、北一辉二人革命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趋势。指出在经历中国革命实践的失败和世界局势变化后，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经历了“支那革命主义”到“对日改造观”的再构筑，但北一辉的思想却异变为了带有侵略意识的“大亚洲主义”。因而，他分别对二人的思想给予了“侠

^① 太田雅夫. 浪漫的革命観の挫折——宮崎滔天と「革命評論」[J]. 展望, 1972 (3).

^② 北川纯子. 宮崎滔天による浪花節台本『天草四郎』をめぐって[J]. 大阪大学紀要, 2015 (2).

^③ 武田清子. アジアの革新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孫文と宮崎滔天[J]. 国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1974 (17).

^④ 初瀬龍平. アジア主義と国際システム——宮崎滔天の場合[J] (この論文は安倍博純・岩松繁俊編集した『日本の近代化を問う』に収録されている。東京: 勁草書房, 1982)

^⑤ 近藤秀樹. 宮崎滔天 北一輝[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95.

气”和“疯狂”的评价。此外，薮田健一郎着眼于滔天变化后的亚洲主义思想，在其《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思潮》^①一文中对滔天的“对日改造观”作了详细分析。他指出，滔天的“对日改造观”是对战后盛行的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作出的敏感反应。相较于过去主张“西欧—亚洲”对立模式的滔天，此时的他更希冀构建一个以自由民权原理为基础的民族自决之上的国际社会。然而，由于宫崎滔天的理想和日本的现实相去甚远，其晚年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实践。此外，上村希美雄、针生清人等人也围绕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展开了研究。^②总的来说，上述研究从阶段分析入手，将宫崎滔天的思想划分了“支那革命主义”和“对日改造观”两大主要内容，呈现了其亚洲主义思想的流变，并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宫崎滔天进行了积极评价。不过，遗憾的是，上述研究对并未进一步确认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抑或“对日改造观”在亚洲主义思潮中的历史地位，也没有将滔天丰富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浪曲家、基督教信徒的形象纳入讨论范畴。因而，并未能以全面完整的视角对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进行历史分析。

在对滔天亚洲主义思想赞不绝耳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从现实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批判性的分析。山口光朔在《滔天的亚洲主义——大陆浪人的一种类型》中^③，通过分析宫崎滔天对孙文革命运动的援助过程、革命还是改革的选择以及其革命团体统一的维持，明确了滔天作为思想家太没有思想性，作为行动家又缺少社会基础的性格。他还评判道，“滔天因自由民权运动而迸发的这种亚洲连带思想带有一定的天真、自由主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打击，这种带有天真浪漫主义的思想已经过时。”^④因而，他得出结论，“滔天的亚洲主义是非

^① 薮田健一郎. 宫崎滔天の『アジア主義』と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世界思潮[J]. 同志社法学, 1996 (48).

^② 上村希美雄. 裏返しの明治を生きる——若い滔天の思想形成[J]. 宫崎滔天全集月報, 1976 (2); 久保田文次. 辛亥革命における孫文、宋教仁——中国同盟会崩壊過程[J]. 歴史学研究, 1974; 深町英夫. 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を振り返る[J]. 東方, 2013 (12); サストル・グレゴワール. 大陸浪人とアジア主義——宮崎滔天を例として[J]. フランス共同ゼ, 2009 (3). 針生清人. 宮崎滔天の“支那革命”の思想[J]. 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 1978 (13).

^③ 山口光朔. 宮崎滔天アジア主義——大陸浪人の一種類[J]. 桃山学院大学紀要, 1963 (2).

^④ 山口光朔. 宮崎滔天アジア主義——大陸浪人の一種類[J]. 桃山学院大学紀要, 1963 (2): 52-54

亚洲主义的亚洲主义。”^①因为，在山口光朔看来，思想如果不明确具体实现什么的话，自身就没有价值。嵯峨隆在《宫崎滔天和亚洲主义》中也谈道，^②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伴随着日本社会的激荡，时而表现“狂热”，时而又流露出“挫败感”。究其原因，是滔天的亚洲思想仅仅是出于主观的革命愿望支撑，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进行客观分析。

概言之，日本学者对宫崎滔天的行动和思想都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围绕宫崎滔天进行的史实性研究不仅从一般性视角对其人生的重要阶段作了详细论述，也从他特殊人生经历入手，对其区别于其他亚洲主义者的浪曲家、基督教徒等形象展开了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追溯滔天思想变化及其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而有关滔天亚洲思想的相关研究也以比较分析法、阶段分析法等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但是，这两方面的研究并未有效地结合起来。国外学界对于宫崎滔天的史实性研究一般未能结合其思想进行分析，而对于宫崎滔天思想的研究又较少考虑其相关人生经历，尤其是他区别于其他亚洲主义者的那些特殊形象，这是其一。其二，在对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进行深入剖析时，日本学者也鲜少关注其人生后半段思想的相关内容及历史定位，尤其是在宫崎滔天“对日改造观”的具体内涵及现实意义上着墨甚少。因而，国外学者对宫崎滔天的相关研究仍然有所欠缺，为此后进一步展开宫崎滔天及其亚洲主义思想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增补空间。

2、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学界向来注重对近代日本思想家的历史研究。因而，中国方面关于宫崎滔天的论著亦是汗牛充栋。只不过基于滔天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联系，国内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滔天与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或孙中山等人的关系为叙述重点，基本上是立于史实的善意论述，从整体上来看缺乏全面性。大体来说，国内研究也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侧重对宫崎滔天进行史实性研究，尤其是其“支那革命主义”的相关实践；二是侧重对宫崎滔天的思想展开论述，探讨其思想在日本社会潮流激荡下的变化与发展。

^① 山口光朔. 宫崎滔天アジア主義——大陸浪人の一種類[J]. 桃山学院大学紀要, 1963 (2): 55.

^② 嵯峨隆. 宫崎滔天とアジア主義[J]. 国際関係. 比較文化研究, 2016 (3).

其中,基于宫崎滔天的相关史实性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赵军的《宫崎滔天与兴中会》。^①该文从宫崎滔天与孙中山的关系、宫崎滔天对兴中会的协助两个方面着重分析了他与中国革命之间的深厚情谊。此外,赵军还分别从主客观的角度阐释了宫崎滔天参与兴中会革命活动的原因,并在最后肯定了他作为“亚洲主义”者的积极形象。李长莉在《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从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看孙中山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对日关系》两文中以当时留守同盟会东京本部成员何天炯的视角展开,论述了他与宫崎滔天在东京同盟会本部声援中国革命,斡旋日本商界协助武器运输等事宜。同时,亦肯定了滔天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深厚情谊。^②此外,刘峰、刘福祥、赵矢元、何燕侠、章开元、周一良等学者也都围绕宫崎滔天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③他们均以宫崎滔天为中心人物展开,通过他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及与革命志士的交往,凸显了坚守亚细亚连带立场的宫崎滔天其行动家与斡旋家的一面。但是,上述研究显然只注意到了宫崎滔天革命家的身份,而实际上滔天的行动随着日本社会的激荡经历了多重角色的转换。也正因为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才使他能成长为一名非典型的亚洲主义者。因此,在分析宫崎滔天及其亚洲主义思想时也应将上述经历纳入研究分析,并进一步追溯滔天思想与行动的联动逻辑。

侧重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研究。这类方向的研究大多不是以专门篇幅对宫崎滔天的思想进行剖析,只是在展开亚洲主义相关探讨时以此为例进行简单叙述。这类研究通过在亚洲主义思潮中定位宫崎滔天,对其思想全貌进行总括性的介绍和评价。譬如,盛邦和在《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指出,虽在时期上滔天属于“侵略亚洲主义”阶段,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是“战略亚洲主义”的延续。这类思想通常主张“亚洲连带”、“中日提携”,故应对宫崎滔天的“支援

^① 赵军. 宫崎滔天与兴中会[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2 (5) .

^② 李长莉. 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J]. 近代史研究, 2012 (3) ; 李长莉. 从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看孙中山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对日关系[J]. 近代史研究, 2020 (1) .

^③ 详见: 刘福祥 赵矢元. 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改良两派之交恶[J]. 历史教学, 1988 (2) ; 章开元. 百年以后看同盟会[J]. 四川大学学报, 2006 (4) ; 阮斐娜着、刘超译. 文士、浪人、说唱传统及近代中日间的文化互动: 以宫崎滔天为个案[J].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2014 (10) ; 宋慧娟. 谈宫崎寅藏对中国资产阶[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8 (3) ; 王晓秋. 《革命评论》与同盟会[J]. 北大史学, 1999 (3) . 周一良.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兼论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的关系[J]. 历史研究, 1981 (4) ; 田幸川. 宫崎寅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15 (1) .

革命”论作具体的学术分析。^①杨栋梁也提出，在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中大体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或曰“流派”，而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就属于典型的“朴素型亚洲主义”，因而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不仅是亚洲主义之流中独树一帜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②在王屏的著作《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宫崎滔天则被定义为了“思想的亚洲主义”，区别于北一辉等人的“行动的亚洲主义”和近卫笃磨的“外交战略的亚洲主义”。王屏认为，滔天是“世界革命者”，其亚洲主义思想没有丝毫侵略中国的部分，故应为“思想的亚洲主义”。与此相反，北一辉虽然没有提出侵略中国，但其主张的“日中军事同盟”理论却在行动上推动了日本的侵华活动。^③此外，在刘峰、徐倩、孙歌等人对亚洲主义进行分析的论著中也对宫崎滔天有所提及并对其作了积极评价，认可了他在亚洲主义中的历史地位。^④

虽然，中国学者长于从宏观角度把握宫崎滔天及其亚洲主义思想，但在众多研究中还是能窥得不少从微观视角对滔天展开集中讨论的研究。赵金钰的《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意义的研究著作。^⑤在本书的第二章中，以宫崎滔天为主要叙述对象，论述了在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后作为大陆浪人的滔天是如何确立起自己的亚洲主义思想与展开相关行动。赵氏认为，滔天的思想大体来说涵盖四个方面，以亚洲连带思想为主体的“支那革命主义”，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并带有社会主义化的“土地均分论”，以迷恋宗教为主的滔天晚年思想和始终带有反政府反侵略色彩的思想主张。此外，学者赵军也对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进行了集中讨论，尤其是对宫崎滔天“支那革命主义”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作

^①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 历史研究, 2000(5): 136.

^② 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80-103.

^③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0.

^④ 参见: 刘峰.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以大正时期为中心的考察[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9(5); 刘峰 田波. 日本大正末期的“亚洲主义”浪潮与中国的回应——兼论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J]. 世界历史评论, 2020(2); 徐倩. 日本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思潮中的亚洲观变迁——以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为中心[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2019(6); 杜小军 闫晓艳. 从世界主义到天皇制——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渊源与流变探微[J]. 史学志刊, 2019(1); 孙歌 吴海倩. 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思想可能性——孙歌访谈[J]. 2019(6); 周丽玫. 从“亚洲一体论”的变质看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认识[J]. 2019(1).

^⑤ 赵金钰.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了详细探讨，并追溯了在此期间滔天“支那革命主义”的具体实践。^①但是，赵军也只是停留在对“支那革命主义”的讨论上，并未提及一战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变化。与上述二人不同，台湾学者沈建国在《宫崎滔天与亚洲主义》中则对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展开了更为全面的论述，展示了亚洲主义思潮下宫崎滔天思想的转变。^②但是，对于滔天的“对日改造观”沈文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其内容，没有深入到批判性的研究领域，也未提及对日改造观在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中的地位。除此以外，向海清、陈毅立等人也从不同视角对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作了相关研究。^③但总的来说，上述学者对宫崎滔天的研究大都着眼于一战以前，对于一战后滔天的经历和思想却少有关关注，只是纯粹地认为他在晚年陷入了一种颓唐，对亚洲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心。由此看来，关于宫崎滔天的思想性研究尤其是对其人生后半段思想的论述仍有所不足，虽已有个别探讨但仍未深入到批判分析的领域。因而，也为进一步考察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提供了研究余地。

总体而言，中国学者对宫崎滔天的研究主要都是以滔天与中国革命及与革命友人关系为叙述重点，有时也会对其思想进行剖析，但从整体上来看缺乏全面性。尤其是大部分研究都只是史实性的论述，缺乏对宫崎滔天思想的深入剖析。诸如，甲午战后以后宫崎滔天的思想随着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如何改变，一战后宫崎滔天“对日改造观”又是如何形成与发展，这些都是过往研究鲜少提及的问题。此外，在对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进行研究时，国内学者只是对其思想变化进行了概述性的研究，在批判性分析上显得比较薄弱。因而，若能以阶段考察滔天亚洲主义思想及行动，深入挖掘二者的相关史实与联动逻辑，并进一步深入到批判分析的领域，或许能对宫崎滔天的相关研究有所补益。

是故，从国内外学者对宫崎滔天的相关研究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宫崎滔天的思想伴随着亚洲主义的历史流变也经历了发展变化，从早期激进浪漫的“支那革命主义”转变后期保守温和的“对日改造观”。在践行亚洲主义思想

^① 赵军. 试论宫崎滔天与“支那革命主义”[J].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C]. 1981; 「近代日本と中国の一接点——大陸浪人、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の關係を中心として」[J]. 駒沢女子大学研究紀要, 1995 (2).

^② 沈建国. アジア主義再考——宮崎滔天を中心に[J]. 日本学研究, 2003 (3).

^③ 向海青. 宮崎滔天のアジア主義思想について[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8; 向海青 王闰梅. 宮崎滔天の早期亚洲主义思想[J]. 外语教育, 2017 (1); 陈毅立. 近代日本の和平反战思想——以宮崎滔天与石橋湛山の比較为中心[J]. 日本問題研究, 2014 (3): 53.

的同时，宫崎滔天的行动也经历了多重角色的转换，不断辗转于现实与理想的二律背反世界。是故，为进一步考察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及其行动，并同时回顾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流变，本文将通过阶段分析的方法，以形成期、成熟期和调整期三个阶段对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展开具体论述。

二、选题意义

19 世纪中叶，亚洲主义发轫于日本。其具体内涵经历了从主张平等联合的“亚细亚连带论”到带有扩张意味“大东亚共荣圈”的一路右倾下滑。同亚洲主义这种流变发生紧密联系的是日本的上层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思想言论交织在亚洲主义这张巨大的网中，进而汇聚成了“千差万别的亚细亚主义”。^①宫崎滔天作为亚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富含平等、连携色彩的“支那革命主义”学说是“亚细亚连带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在不同时期对亚洲主义的调整 and 变化更是作为思想史研究的范本。

是故，以“宫崎滔天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为题存在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梳理宫崎滔天其思想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演变轨迹，进一步剖析宫崎滔天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完善关于宫崎滔天的相关研究。进入 20 世纪以后，日本亚洲主义的相关研究开始转向实证方面。但是，作为实证研究中典型个例，学界关于宫崎滔天的研究却大多只停留于其前半段人生，对一战以后宫崎滔天的思想变化鲜少关注。实际上，伴随着对亚洲主义的脱离和复归，宫崎滔天的思想也在调整与挫折中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而这样的变化也进一步凸显了他在亚洲主义群体中的独特性和典型性。此外，在“千差万别的亚细亚主义”中，宫崎滔天的学说虽始终游离于亚洲主义的主流脉络发展之外，但其思想和行动却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倾尽毕生心血扶持革命的宫崎滔天也与革命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有必要于复杂多变的“亚细亚之流”中对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作进一步分析探讨，以求完善关于宫崎滔天的相关研究。

其次，通过追溯宫崎滔天的思想及行动，亦可深化对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理

^① 竹内好. 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M]. 东京：筑摩书房，1970：22.

解,丰富关于亚洲主义学说史的相关研究。伴随着近代日本社会的巨变,亚洲主义从带有地缘性和文化同质性的积极思想异变为了将日本推向战争深渊的精神鸦片。在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影响下,学界关于亚洲主义的讨论多围绕其侵略性和扩张性的一面展开。但是,亚洲主义中还存在肯定亚洲传统与价值,提倡区域内平等提携的朴素型亚洲主义。宫崎滔天就是此类亚洲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支那革命主义”学说作为“亚细亚连带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传达的亚洲连带精神,民族互助思想在今日看来亦是弥足珍贵。因而,作为亚洲主义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对宫崎滔天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亚洲主义学说史的相关内容,亦有助于耙梳和整理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流变。

最后,回顾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和实践,一方面可为当今中日关系或区域整合提供有意义的行动参照;另一方面亦可在实证研究中对亚洲主义进行再探讨,分析这一思潮在新时代发展之下的现实意义。在当今国际大环境下,尤其是区域走势扑朔迷离的东亚,构筑亚洲共同体的需求仍然存在,而个人经验在其中亦是必不可少。在这之中,宫崎滔天作为一个积极且正面的亚洲主义者形象,不仅为中国革命贡献了巨大力量,而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更成就了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是故,回顾“亚细亚之流”中宫崎滔天的思想和行动,可为当今中日关系或区域整合提供有意义的行动参照。另外,通过回溯宫崎滔天的思想变化,亦可折射出亚洲主义的演进轨迹。而对亚洲主义的发展流变进行再探讨,有助于梳理其中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实现对东亚问题的整体性认知和规律性把握。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宫崎滔天与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历史考察”为题,通过在“亚洲主义的发展流变”中回顾宫崎滔天的一系列革命实践,考察其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进一步探讨宫崎滔天亚洲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从而展开关于未来中日关系乃至亚洲区域合作的历史想像。

三、创新之处

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于亚洲主义的发展流变下剖析宫崎滔天的思想与行动,尤其是对甲午战后其思想呈现的变化与特点展开深入分析,从而凸显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独特性。同时,本文也通过宫崎滔天的思想流变,借以回顾亚洲主

义的发展历程。通过二者之间的联动关系阐明亚洲主义团体的演进轨迹，并进一步探讨在历史与现实之下关于未来亚洲的新想像。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应用到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不同方法。在比较研究法上会截取到其他亚洲主义者的形象，比如同样追求“亚细亚连带”的萱野长知及后来与该思想背道而驰的内田良平等人。通过对比上述人物的思想主张突出宫崎滔天在亚洲主义群体中的独特性。此外，本文也将运用统计学、外文翻译等跨学科研究法，力求在此基础上得出较为客观的论文。

在文献材料上，本研究立足于大量日文一手文献，譬如宫崎滔天本人所著传记、宫崎滔天与孙中山笔谈、宫崎滔天书信等目前国内尚未完全公开的文本资料。同时兼顾国立国会图书馆（NDL 国立国会図書館）、国立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日本学术报告数据资料（IRDB 学術機関リポジトリデータベース）等电子文献，使文章立于丰富可靠的历史资料上。

总之，本文在遵循唯物史观的前提之下，通过文献分析和批判总结的方式，借助中日两国相关的研究成果，实现在客观立场上考察宫崎滔天与近代亚洲主义的研究目的。

第一章 早期亚洲主义与宫崎滔天思想的形成

进入 19 世纪下半期，伴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及西方势力的入侵，东亚地区传统的华夷秩序走向崩溃，亚洲内部格局面临重新整合。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围绕如何消解东西方冲突及本国的归属问题，日本人对亚洲的发展前景展开了历史想像。由此，近代日本的“亚细亚连带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在亚细亚连带的历史机运下，宫崎滔天这类带有责任意识的大陆浪人开始自觉背负起亚洲的命运，他们在“千差万别的亚细亚主义”中求同存异，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构图，最后于时代的激烈交锋中逐步成形。

第一节 “亚细亚连带论”的提出及发展

幕府末期，在西方势力的不断入侵下，东亚各国面临严重的主权危机和领土危机，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联合亚洲对抗西方的思想。由此，以“联亚抗欧”为雏形的“亚细亚连带论”在日本觉醒，亚洲主义开始萌芽。尔后，在自由民权运动的进一步推动下，“亚细亚连带论”在民间并广为传播并开始以大型实体组织的形式出现，亚洲主义正式成形并逐步走向成熟。一直到甲午战争以前，以“亚洲各国平等、联合”为核心，“联亚抗欧”为第一要义的“亚细亚连带论”都是亚洲主义的主流。

一、幕府末期“联亚抗欧”意识的觉醒

1853 年，黑船事件爆发，在美国船坚利炮的威胁下日本被迫打开了国门。面对空前的压力与危机，日本国内围绕“攘夷”和“开国”两大前途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在后者“开国进取”的思想中便萌生出了以中日韩三国联合抵抗欧洲，守护亚洲的“联亚抗欧”意识，而这也是亚细亚连带思想的雏形。

“联亚抗欧”意识的直接来源是幕末启蒙思想家横井小楠的“和平主义”和“大同思想”，以及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①横井小楠（1809-1869）是日本著名的改革思想家。同幕末大部分思想家一样，横井小楠也对日本地位抱有不

^①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 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0.

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日本是“三千年来独立于天地之间的神州之国”，而西方各国不过是“丑虏”罢了。^①但是，在经历了佩里叩关的巨大冲击后，横井小楠迅速摆脱了旧有的日式华夷秩序观，深刻地认识到闭关锁国才是导致日本落后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互相交通利易，以公共之道经纶天下”的“和平主义”开国观。^②不同于“开国论”中其他思想家诸如佐久间象山等人武力开国的方式，横井强烈反对像西方列强一样诉诸战争，主张以公平贸易、合作提携的方式谋求独立富强。在其著作《国是三论》中就曾多次提到贸易的重要性：“素来与外国通商，乃交易之大者，其道乃天地间固有之定理。”^③在横井看来，在敌强我弱的既定现实下，只有实行贸易通商为主的“和平主义”开国观才能当前挽救困局。因而他强烈反对日本进行军事扩张，认为此举“必会招来后祸”。^④

与此同时，“和平主义式”的开国观也促成了横井对其他亚洲国家乃至世界的同情与关怀。对于中国，横井就曾强调日本与中国乃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对其现今遭遇不可视而不见，日本应与中国相互提携，共同抵御西方势力：“日本支那两国本唇齿相依，而今唇亡齿寒，支那覆辙在前，日本不可坐视不管。”^⑤而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横井则提出了“万国一体，四海兄弟”的远大构想：“今华夷本无差别，万国一体，同为人类。”^⑥不管是在当时的日本还是整个东亚，这都是相当卓越的识见。而横井思想中所包含的“和平主义”及“连携清国”、“四海兄弟”的大同理念也成了后来亚细亚连带思想的雏形。此后，随着日本开国步伐的前进，不少有识之士也在此连带思想下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战略构想和连横策略。

时任江户海军奉行^⑦的胜海舟（1823-1899）便是这一时期“亚细亚连带”策略的有力倡导人之一。胜海舟是幕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早年曾前往西洋学习兵艺，回国后致力于振兴日本海军。与横井小楠反对武力，主张贸易的方式不

^① 李少军. 魏源、冯桂芬与横井小楠对外观之比较[J]. 武汉大学学报, 1998 (3): 3.

^② 佐藤昌介. 日本思想大系 55 (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1: 447-448.

^③ 佐藤昌介. 日本思想大系 55 (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1: 446-447.

^④ 陈卫平. 横井小楠思想简论[J]. 山东社会科学, 1993 (1): 70.

^⑤ 佐藤昌介. 日本思想大系 55 (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1: 448-450.

^⑥ 佐藤昌介. 日本思想大系 55 (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横井小楠・橋本左内) [M]. 東京: 岩波書店, 1971: 450.

^⑦ 奉行: 日本存在于平安时代至江户时代期间的一种官职。

同，胜海舟希冀通过“海防自救”的方式抵御西欧列强。1861年，俄国强占日本对马岛事件发生后，胜海舟在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下提出了以“加强海防”为基础的“三国同盟论”。^①胜海舟认为，若以“以邻国朝鲜为绪端，尔后及于支那”，游说亚洲各国“共同壮大海军，互通学术”^②，即可与西洋的船坚利炮相抗衡。显然，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是利用亚洲各国在军事上的连带实现“联亚抗欧”的目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胜海舟虽然主张用武力对抗西欧，但对于邻国，他始终不赞同采用军事攻伐的手段。这一点在其晚年关于甲午战争的评价中可见一斑：“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并不会给日本带来诸多利益，反倒会使得日本失去经济上与邻国合作的机会。在这场战争之后，日本将要面临的或许是更大麻烦。”^③可见，同横井小楠一样，胜海舟的“三国同盟”也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连带亚洲，抗衡西欧。只不过，相较于主张经济贸易方面提携合作的横井，胜海舟更注重利用军事与文化方面的协作。

从横井小楠的“和平贸易”、“提携清国”到胜海舟的“三国同盟论”，以“联亚抗欧”为基础的亚细亚主义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他们思想意识中所蕴含的“平等”、“提携”观念也构成了亚洲主义的基本要素。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日本的知识分子围绕这一基础提出了形态各异的亚洲主义理论。

二、兴亚会与“日清提携论”

19世纪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兴起。因自由民权派对“国权”的推崇及“自由平等”思想的宣传，“联亚抗欧”意识在日本盛行一时。与此同时，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受横井小楠和胜海舟等人的影响，提出了更为现实和具体的亚洲连带思想，并开始追求以实态化组织的形式宣传亚洲主义。兴亚会及其主张的“日清提携论”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曾根俊虎（1847-1910）是日本著名的兴亚家，早年曾赴中国实地考察，并以此次见闻写成了《清国漫游志》。面对当时亚洲各国被西欧压迫和欺辱的现状，曾根俊虎深感痛心：“亚细亚各邦萎靡姑息，苟且残存。为力挽此现状，近似倡

^① 勝安房. 勝海舟全集. 幕末日記[M]. 講談社, 1976: 80—82.

^② 勝安房. 勝海舟全集. 幕末日記[M]. 講談社, 1976: 86—87.

^③ 勝安房. 勝海舟全集. 幕末日記[M]. 講談社, 1976: 191.

日清提携，广开兴亚一会，以滋奋勉，后推及亚细亚诸邦，共谋独立富强。”^① 曾根认为，实现亚洲各国独立富强的前提基础是“日清”两国的独立富强，而“日清”两国独立富强的关键又在于“日清提携”。因而，曾根提出创建“兴亚会”此类实体组织以推动日清两个核心国家的联合，再进一步提携和带动整个亚洲以抵御列强侵略。这便是所谓的“日清提携论”。“日清提携论”是早期亚洲主义的主流理论之一。受胜海舟“三国同盟论”及横井小楠“和平主义”发展观影响，曾根俊虎的“日清提携论”也是意图通过中日两个核心国家在文化、军事及经济上的联合抵御西欧列强，挽回亚洲隆兴。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1878年由曾根俊虎等人策划，近代日本第一个亚洲主义民间团体“振亚社”成立了。振亚社秉承曾根俊虎的“日清提携论”，以“振起亚洲诸国之衰弱，挽回往昔之隆盛”为宗旨。^②振亚社的成立，意味着“亚洲连带”思想的正式提出，也是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成立的标志。^③不过，振亚社只是以曾根俊虎为代表的海军中层军官为主，在人员数量和组织规模上十分有限，因而在其成立期间并没有具体的对华活动。不久以后，主要牵头人大久保利通遇刺，振亚社改头换面为兴亚会。较之局限于海军势力的振亚社，兴亚会在组织上更具规模，并开始着手将“日清提携”的思想主张付诸实践。

兴亚会成立于1880年，初代会长为长冈护美（1842-1906），副会长为渡边洪基（1847-1901）。二人均在明治政府外务省担任要职，并与欧美列强有过直接照面。因而他们深知当前亚洲面临的艰难局势，对振兴亚洲有着强烈愿望。会员中还有“兴亚家”曾根俊虎、汉学家重野安绎（1827-1910）、大久保利通之子大久保利和（1861-1949）以及中国方的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王韬等人。^④比起振亚社，兴亚会的组织规模更加宏大，人员数量也急遽攀升，吸收了诸如何如璋（清钦差大臣）、福泽谕吉（1835-1901）等中日两国的政界人士及重野安绎、岸田吟香（1833-1905）等文化界名流，政治与社会影响力大为提升。^⑤在章程条例上，兴亚会以“兴正道而拯亚洲颓势”为首要目标，以曾根俊

^① 曾根俊虎. 清國漫遊記[M]. 東京：續文舍，1883：66-67.

^②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 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6.

^③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 历史研究，2000（5）：135—136.

^④ 黑木彬文. 兴亜会のアジア主義[J]. 法学研究，2005（3）：622.

^⑤ 黑木彬文. 兴亜会、亞細亞協會の活動[J]. 政治研究，1992（2）：3.

虎的“日清提携论”为指导思想。^①在其章程中对此有着如下具体说明：“亚洲诸国必须相互帮助。同文同种、辅车相依。不使碧眼人窥我等间隙。”^②兴亚会成立后，该组织也进行了相应的宣传活动，譬如创建最早的“支那语学校”。该校除必要的语言教育外，还设定了“汉学”、“译书洋算”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培养课程。此外，兴亚会还组织了相应的传达机构“公报局”，以此输送“通信员”前往亚洲各地，为会员们提供广泛的交流信息。^③

1883年1月，兴亚会以改名之名义进行了改组，更名为亚细亚协会。骨干成员不变，采取横跨中日韩三国的组织形式，继续在亚洲各国吸收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入会。亚细亚协会的宗旨依然为“日中提携、亚洲合作”。^④与前稍有不同的是，亚细亚协会还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及收回商权”，主张通过兴办实业来振兴亚洲。^⑤同样，亚细亚协会也很重视与中国方面的现实活动，譬如招收中国籍会员入会，教授中文等，甚至连其《兴亚章程》也都是用中文书写。当然，这类活动也在中国、朝鲜等亚洲主要国家得到了良好的回应。

从振亚社、兴亚会再到亚细亚协会三者在兴亚事业上一脉相承，同属“日清提携”思想影响下而成立的亚洲主义组织，带有很强的同根性和连续性。这类组织以“亚细亚连带”为宗旨，以抵御西方列强为共同目标，代表着早期亚洲主义者渴望联合、抵御侵略的朴素愿望。因而，从第一个亚洲主义团体振亚社的成立到甲午战争之前的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早期亚洲主义。^⑥这时的亚洲主义以对等关系为前提，以东亚合作为目标，并带有一种“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明显特征，具有一定进步意义。^⑦

但很快，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得极端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获得了空前的话语权，而主张“中日提携”的亚细亚协会因与当时日本政界的主流思想相悖，在日本国内逐渐被边缘化。随着中日关系的

^① 兴亚会编. 兴亚会報告(8) [M]. 東京: 兴亚会出版会社, 1880: 77.

^②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 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06.

^③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 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36.

^④ 黑木彬文. 兴亚会、亞細亞協會の活動 [J]. 政治研究, 1992 (2): 8.

^⑤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J]. 历史研究, 2000 (5): 135—136.

^⑥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J]. 历史研究, 2000 (5): 135—136.

^⑦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8.

进一步恶化，亚细亚协会就此陷入了低迷。随之而来的是与前各亚洲主义组织性质稍有不同东亚同文会，它的出现也意味着亚洲主义中另一种潜在力量正浮出水面。

第二节 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

当亚洲主义在民间不断发展并对日本的外交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之时，有一种观念虽然在亚细亚的浪潮中没有太大影响力，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便是以宫崎滔天及其兄长宫崎弥藏（1867-1896）为代表的“支那革命主义”。从1887初次接触这一理论到甲午战争前后，这一时期是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支那革命主义”的形成期。除上述“亚细亚连带论”外，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反应下，他的亚洲观也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底色。

一、家庭及基督教的影响

1871年，宫崎滔天生长于日本熊本荒尾村的一个武士家庭，是家中第八子，亦是末子，与兄长宫崎八郎、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合称为宫崎兄弟。其父宫崎长藏是当地豪农，亦是著名的剑道师。早在幼年时期，宫崎滔天的父亲就经常教导他们“要做英雄，要当大将”。^①母亲亦时常教诲他们“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莫大耻辱”，^②鼓励宫崎兄弟应当志存高远，而非安于苟且。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宫崎滔天，滔天也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侠肝义胆、豪迈壮直的品行。除父母的教育外，宫崎滔天也深受三位兄长的影响。大哥宫崎八郎是熊本县民权党的主要负责人。八郎经常在《评论新闻》等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关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以及抨击天皇独裁体制的激烈言论，后来在西南战争中英勇牺牲。因为八郎的战死，宫崎滔天开始将明治藩阀官府视为杀害兄长和阻碍自由民权运动的仇敌。这样，年少时虽不知自由民权为何物的宫崎滔天却自来对官兵、官员等凡是带有“官”字的人都“嫉恶如仇”，颇具侠义精神。^③而这种无视正统的心理也

^①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0.

^②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

^③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

恰巧塑造了滔天不同政府妥协的谋反精神，使其日后在与“官府”、“权贵”的交往中依然能坚持自己的原则。

宫崎滔天的另外两位兄长宫崎民藏和宫崎弥藏也是坚定的自由民权主义者。他们经常与滔天一起探讨一些社会和哲学问题，对少年滔天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宫崎民藏向来关心土地问题，主张恢复地权以实现土地平均主义。通过民藏，滔天在少年时就接触了“土地平均主义”思想，对佃户生活及土地问题尤为关心。这也使得他时常站在被压迫人民、民族的立场上思考一些革命问题。同主张温和改良思想的民藏不同，二哥宫崎弥藏是典型的暴力革命者，弥藏认为“拥护民权，惟赖暴力之一途也”，^①因而他提出了以暴力革命为中心的“支那革命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也为后来的宫崎滔天所继承，并成了他坚持“一生的大方针”。^②幼年时期自由民权式家庭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宫崎滔天豪迈壮直、嫉恶如仇的性格，培养滔天成为了“天生的自由民权家”。^③而在目睹了兄长们对自由民权的坚定追求后，少年滔天心中更是悄然埋下了“立世救民”的思想种子，成为了日后推动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础和本源。

1885年，宫崎滔天进入熊本县的大江私塾读书，接受新式的近代化教育。在学校中，滔天正式接触到了自由民权思想，并由此开始关注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④但很快，因明治政府的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在日本衰落，大江私塾被迫关闭，还没来得及赶上运动高潮的宫崎滔天和其他人一样成了一名“大陆浪人”。^⑤也是这一时期，不得不重新考虑发展方向的宫崎滔天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兴趣。

1886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宫崎滔天邂逅了基督教并从牧师处得到的一本名为《基督教三纲领》的小册子。在仔细阅读该小册后，宫崎滔天对其中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尤其是读到“天下万民万国受同一真神支配……天下如同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0.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8.

^③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8.

^⑤ 大陆浪人：指那些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但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落魄人士。这些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萌发出一种“兴亚抗欧”的思想意识，主张“亚洲联合”。自由民权运动衰落后，他们便开始在大陆寻找新的市场，加入了玄洋社、黑龙会、东亚同文会等亚洲主义团体。后来，随着日本对亚政策的改变，他们中多的大多数人开始从事翻译、间谍等破坏活动，甚至成为头号侵略分子。但是，大陆浪人中间也不乏宫崎滔天这类始终坚持“中日提携”的人。（刘家鑫.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7.）

一个太阳照耀”，“世界同胞一种观念”，“每一个人都是超越国家的世界之子”这类字眼，给宫崎滔天留下了深刻印象。^①据武田清子的研究，宫崎滔天的基督教信仰主要集中于对其中“世界一家、四海兄弟”宗教宽容理念的共鸣。^②当时，和大部分浪人一样，宫崎滔天对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亚洲各国深感痛心。然而，自由民权运动的低落却让滔天一时间无以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满腔热血只得化作心灰意冷。在这样的时机下，基督教的出现，特别是其中“世界同胞、四海兄弟”的宗教宽容理念让宫崎滔天在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原点。宫崎滔天把对自由民权的向往寄托在了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中，在那段贫苦的日子里找到了精神慰藉。

借着基督教宽容博爱的宗教原则，宫崎滔天对当前西方的侵略行径发出了强烈谴责，要求恢复民权和伸张正义：“余深信人类有同胞之义，故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余亦信奉四海一家之说，故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深恶之事，不可不除，憎厌之事，不能不去。否则，世界大同的理想终是梦想。”^③在滔天对西方各国侵略行径表达愤慨的同时，其基督教思想中特有的“人类同胞、四海一家”的崇高信念也跃然纸上。显然，在追求基督教的精神道路上，宫崎滔天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对于当前世界不公之现状，滔天深感责任重大，而这种责任和意识也成了触动宫崎滔天走上“扶倒救衰，改变世界”革命道路的精神力量。^④正如宫崎滔天自己所说：“我由家庭的熏陶再到基督教世界的培养，得到的是自由民权思想的开拓和充实，助长的是对行动主义的决心和勇气。”^⑤

自由民权式家庭的成长经历在少年滔天的内心深处埋下了“救世立民”的革命种子，成为了日后推动宫崎滔天走上革命道路的力量源泉。而少年时期的基督教经历又培养了宫崎滔天“世界公民”般的责任和意识，为其思想铺上了博爱仁义、平等宽容的底色，进一步激励着宫崎滔天走向“伸张民权、扶倒救衰”的革命道路。正如三民木夫所指：“不论是自由民权（运动），还是邂逅基督教，埋

^① 向海青 王闰梅. 宫崎滔天的早期亚洲主义思想[J]. 外语教育, 2017 (1) 121—127.

^② 武田清子. アジアの革新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 孫文と宮崎滔天[J]. 国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1974: 26.

^③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7.

^④ 陈毅立. 有关辛亥革命以后“亚洲主义”构想的考察——以孙文和宫崎滔天为代表[J]. 江汉论坛, 2011 (4): 11.

^⑤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9.

藏在滔天意识深处的是对‘天下苍生’的共鸣和想要拯救他们的心情，而这也是其思想的实际内涵。”^①

二、“支那革命主义”思想的启蒙

从1886年前往东京专门学校就读以后，宫崎滔天就接触到了更为丰富和广阔的精神世界。他一面在逐渐衰退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摸索人权与自由的真理，也一面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寻求精神食粮。但是，二者都没能进一步指引滔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革命道路，真正推动其革命思想萌发的是滔天的兄长宫崎弥藏。在弥藏“支那革命主义”的启发下，宫崎滔天心中“立世救民”的思想种子才开始生根发芽。不过，宫崎滔天接纳和确立“支那革命主义”思想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

早在1887年的暑假，宫崎滔天便接触到了“支那革命主义”的构想。这一年，二哥宫崎弥藏来到东京与正在此地求学的滔天一同居住。弥藏比滔天年长四岁，早前一直在大阪求学。大阪在当时也是自由民权运动的中心，同时以“亚细亚连带”为基础的兴亚理论也在此地广为传播。在时代的激烈交锋下，宫崎弥藏的思想在这个时候趋于成熟。来到东京后，他便把早前就在心中成形的革命理念——“支那革命主义”吐露给了滔天。

宫崎弥藏认为，“当前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而弱者的权利自由却一天天地丧失殆尽”。因此，弥藏提出：“必须速谋恢复之策，否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②弥藏“速谋恢复之策”的想法与滔天想要实现“人类同胞、世界大同”的理想不谋而合，^③二人都认为眼下拯救亚洲衰颓之势已是迫在眉睫。但是，同其他亚洲主义者不同的是，宫崎弥藏将兴亚的关注点放在了积贫积弱的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④弥藏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虽然孱弱不堪，但胜在地广人多。”^⑤因而，若能在中国“扫除弊政，统一治理，并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权，更足以号

^① 三木民夫. 宫崎滔天における『支那革命主義』の確立—『暹羅殖民』活動を中心に[J]. 民衆史研究, 1987(12): 212.

^②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1.

^③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4.

^④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1.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東京: 平凡社, 1971—1976: 70.

令宇内，行道万邦”。^①在弥藏看来，作为传统大国的中国虽现下残破不堪，但因其地大物博，人口繁多，一经改革必然能重振旗鼓。而若能以中国革命激励亚洲各国，黄种人必能战胜白种人，适时将会迎来亚洲及世界的解放。显然，宫崎弥藏的“支那革命主义”是以中国为中心开展革命，进而连带亚洲诸国，以改变目前不公的现状。虽然，此构想与早期亚洲主义的“中日提携论”相似，但因弥藏的“支那革命主义”是主张由“中国连带亚洲”，因而显得更为激进。但是，当时的宫崎滔天正沉湎于基督教的精神世界，对弥藏所说的“支那革命主义”并没有太大兴趣，反倒是劝说有些迷惘的弥藏同他一起遁入了基督教的世界。^②不过，宫崎弥藏的此番言论还是在宫崎滔天内心深处“留下了一点关于中国的印象”。^③

1890年，宫崎滔天又邂逅了主张泛神论的伊萨库·亚伯拉罕。伊库萨宣称自己是“人类之子”、“超越国家的世界之子”。^④这一点与基督教中博爱平等的宽容理念有着共通之处，因而滔天开始对伊库萨产生共鸣。但是，伊库萨却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主张建立无政府的人类世界。在伊库萨普遍主义、人类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宫崎滔天又再度陷入了彷徨，他一面否定着基督教的神性，又一面无法舍弃其中“人类同胞、世界一家”的精神内核。因而，陷入思想斗争的宫崎滔天决定暂行前往海外以摆脱这种无谓的羁绊。但是，此时二哥宫崎弥藏的再度出现却给陷入迷惘的宫崎滔天带来了新的希望。

三、“支那革命主义”思想的确立

1891年的夏天，宫崎滔天准备前往夏威夷留学。临行之前，宫崎弥藏特意赶到长崎与滔天挑灯夜谈，再次提出了“支那革命主义”的想法。这一次，轮到陷入彷徨的宫崎滔天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革命道路了。

当时，宫崎滔天已经在信奉基督教的道路上看到了宗教偏见和其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面，并逐渐有了脱离基督教的想法。在一次放假归乡的途中，宫崎滔天听闻乡里辛苦耕作佃农竟还是无法维系日常生活，心中便不禁发出疑问：“到底

^①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1.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32.

^③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40.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523.

是应该先给面包呢，还是先给福音呢？”^①大哥民藏（八郎死后，称民藏为大哥）替他解惑说：“寻求宗教的精神寄托不过是一时姑息的办法，并不能给那些身处贫境的人带来现实的好处。所谓真正的仁义正道乃是去寻求追溯人权本源的现实方策。”^②在民藏的指点下，宫崎滔天恍然大悟不管是伊库萨还是基督教都不能带来真正的“面包”，要想拯救万民苍生还是要依靠现实手段。由此，宫崎滔天才逐渐从宗教世界的精神迷惘中脱离出来，如梦初醒般地感慨：“非有一个现实良策一变世界万邦贫民的生活不可”。^③只不过，当时的宫崎滔天正苦于“寻一良策却迟迟不出现”的烦恼中。^④

但是，二哥宫崎弥藏的再度出现及其带来的“支那革命主义”却给此时正陷入精神迷惘的滔天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带领他真正走上了“以仁义正道扶倒救衰”的革命道路。^⑤宫崎弥藏向宫崎滔天一阵见血地指出，改变现今世界残破不堪现状惟有“武力”一法。因为，不论是宗教福音，还是土地平均主义都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它们终会被暴力取代和践踏。因而，弥藏提出，无论是维护民权还是将民权推而广之，“武力”都是必要的基础。而现下残破不堪的中国正是建立这一基础的大好时机。^⑥宫崎弥藏的一番阐释让正陷入迷茫的宫崎滔天茅塞顿开，滔天恍然大悟般感慨原来“暴力革命”才是唯一方策：“余以为，能至兹者，惟赖暴力之一途也。”^⑦由此，宫崎滔天开始对“支那革命主义”产生强烈共鸣。

随后，宫崎滔天亦对弥藏以“支那”为革命中心的想法表示了赞同。他进一步肯定道：“暴力权术若不能施行之，亦仅是梦想。支那以为彼处人多地广，余甚有为革命所迫之机。故余欲选择支那，以此作暴力之革命根据地。”^⑧在这里，宫崎滔天对选择“中国”作为革命根据地只陈述了极其简洁的理由。实际上，此时的宫崎滔天对中国并无深刻印象，对“支那”的肯定也大都是因“日清提携”为主流亚细亚连带论的盛行而产生的一种向往之情。因此，此时真正触动宫崎滔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9.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9.

^③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0.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0.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0.

^⑥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523-525.

^⑦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1.

^⑧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2.

天的是弥藏以“暴力”为手段的现实方策，及“支那革命主义”中的救世情怀。此二者正好言中了宫崎滔天向来追求的“世界公民、四海一家”理念，促使埋藏在他心中的革命种子不断生根发芽。在与弥藏彻夜详谈之后，宫崎滔天决定继承他的“支那革命主义”学说，而这一夜也成了宫崎滔天“一生大半方针确立的一夜”。^①后来，回忆起这一晚的情形时，滔天慷慨激昂地写道：“余闻之起而舞绝，余破宿而思之不绝”。^②

大体来说，宫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义”学说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革命首要任务是抵御西欧列强侵略，挽救亚洲各国之衰颓。第二，革命方式是采用暴力手段进行。第三，革命中心在中国，而非日本。^③对比其他“亚细亚连带论”，宫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义”显得更为激进，其中以中国作为革命中心的构想更是在亚洲主义思潮中独树一帜。而这一构想虽是由宫崎弥藏率先提出，却是在宫崎滔天的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随着宫崎滔天展开其“亚细亚连带”行动的初次尝试，“支那革命主义”才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三节 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尝试

在确定以“支那革命主义”为一生的大方针后，宫崎滔天便开始计划前往中国。但彼时的宫崎弥藏已身患胃病，在老家熊本静心休养。宫崎滔天只得先行前往暹罗进行考察，而这次暹罗之行也成了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初次尝试。通过在暹罗详细的周游考察，宫崎滔天从民族及人种的角度肯定了中国人的强大，亦从客观上印证了以中国为革命中心的现实性，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支那革命主义”的信心。

1894年，宫崎滔天接受渡边元^④的资助后前往暹罗进行考察，在这里展开其“支那革命主义”的初此实践。宫崎滔天此次出国目的有二，一是向当地华人学习语言和风俗，尽快了解中国文化。二是寻找革命志士，结识英雄豪杰，为日后

^① 衛藤藩吉. 滔天と清国革命はどうして結びついたか[J]. 思想, 1968: 20.

^② 衛藤藩吉. 滔天と清国革命はどうして結びついたか[J]. 思想, 1968: 20.

^③ 赵军. 试论宫崎滔天与“支那革命主义”[J].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C]. 1981: 673.

^④ 渡边元(1855—1918)长崎县人，以经营煤炭、矿山、水产为主的大资本家。渡边元与朝鲜著名改良政治家金玉均交好，进而结识宫崎滔天。当时，宫崎滔天本打算前往朝鲜，但金玉均遇害。后经渡边元提议，才确定先前往暹罗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风俗，结交革命志士。

“支那革命”大业做准备。在暹罗的考察学习，也让宫崎滔天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势力：“他们的人数比本国人还要多，实力也远在本国人之上”，“如果在这里的支那人一旦休事返回本国的话，像暹罗这样的国家将会陷入一片寂静。”^①甚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看到暹罗的许多中国人“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一无所有的劳动工人到家产万贯的商人，并由此获得极高社会地位”后，^②宫崎滔天还发出了这样的赞叹：“我邦人对支那人的认识可能过于粗浅了。我相信这样的人民是绝不能被轻易看低的，与其相信英俄这样的强权不如相信在眼前的这些支那人……他们真是一种奇妙的物种啊，我肯定在将来的世界的绝对势力中一定会有支那人的一部分。”^③自此，宫崎滔天才开始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出发建构起对中国的现实印象。而这种现实印象也继续推动着他以“支那革命”为基础的“亚细亚连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对中国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通过这几年的考察，宫崎滔天对于亚洲局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看来，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如今已是人心涣散、内政紊乱。在欧美列强的打压下呈现出“忙于内争外哄，每日乏其力”的局面。^④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虽然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现了国力的强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亚洲各国中唯一能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国家。但是，日本终归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因而不具备推动世界的力量”。^⑤

所以，结束暹罗之行的宫崎滔天感慨道：“要想对抗西力东渐，也只有利用与我们相邻的大国中国。如今，中国因为政情混乱的缘故，恰巧有革命的可能性。并且，相较于日本中国拥有数十倍之国土面积和人口，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完全可以胜任革命任务的。”^⑥显然，通过暹罗之行，滔天开始对中国抱有很大信心。他认为，中国有着革命的诸多条件，而中国人也是值得信赖的。如今中国虽局势动荡，但这也恰巧增加了革命的可能性。因而，自暹罗之行后，宫崎滔天明确了中国作为支那革命主义主体的现实性，其内心“支那革命主义”的想法也更加坚定。在回程的日记中，宫崎滔天对“支那革命主义”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释：“若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45.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70.

^③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45.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33.

^⑤ 沈建国. アジア主義再考——官崎滔天を中心に[J]. 日本学研究，2003（3）：226

^⑥ 薮田謙一郎. 官崎滔天のアジア主義と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世界思潮[J]. 同志社法学，1996（271）：56.

使支那复兴，并借此树立一种主义。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接而振作，菲律宾、埃及亦可得救。继而就是法兰西等欧洲诸国，我们所谈之人权理想也可实现。适时宇宙之间将会建立新的纪元，世界范围内都是自由民权之国。”^①自此，宫崎滔天式“支那革命主义”正式成形。同宫崎弥藏一样，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也是希冀以中国为根据地开展暴力革命，进而改变亚洲时局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其核心仍然是“中国革命中心论”。不过，除了对中国的价值认同外，在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中也可以清晰窥见其“世界公民”、“四海一家”的思想底色。因为，在宫崎滔天的叙述中，中国革命只是第一步，最后的“恢复世界人权”才是最终目的。这种伟大、崇高的理想也成了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所独有的特质。因此，虽然在大体上继承了弥藏的“支那革命主义”，但是滔天也在其中加入了许多自己的经验，使其成为了更为完整和具有可实践性的亚洲主义学说。可以说，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是以宫崎弥藏的构想为基础，由宫崎滔天的个性和经验紧密结合形成。

同早期亚洲主义者一样，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也是在欧美列强侵略亚洲的忧患意识下产生。首先，受民间主流思想“亚细亚连带论”的影响，宫崎滔天开始自觉地将日本同中国乃至亚洲的命运连带起来，积极谋求亚洲各国的独立富强。而生长于自由民权式家庭的独特成长经历又在宫崎滔天内心留下“人权”、“革命”的思想种子，成为了激发他亚洲连带思想的本源。与此同时，少年时期对基督教“博爱仁义”宗教精神的信仰又进一步推动宫崎滔天走上亚洲连带的革命道路。伴随着二哥宫崎弥藏带来的“中国印象”，一副清晰的“支那革命主义”图式开始在宫崎滔天的脑海里展开。由此，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正式成形。最后，通过暹罗之行宫崎滔天进一步肯定了作为革命主体的“中国”，坚定了对“支那革命主义”的信念，将其发展为完整和具有可实践性的亚洲主义学说。

^① 薮田謙一郎. 宮崎滔天のアジア主義と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世界思潮[J]. 同志社法学, 1996 (271): 59-60.

第二章 亚洲主义的异变与宫崎滔天思想的成熟

甲午战争的胜利给日本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极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地不断膨胀下，亚洲主义亦在此时发生明显异变，向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侵略主义”急遽右转。就在日本朝野上下沉醉于甲午战争胜利的“大陆雄飞”美梦之时，宫崎滔天却对此发出了清醒的批判。与此同时，他怀揣着“支那革命主义”的坚定信念前往中国，力图实现自己“亚洲连带”的思想主张。在与中国革命的安危与共中，宫崎滔天的思想也迅速成熟，并表现出与其他亚洲主义者迥然不同的一面。

第一节 甲午战后“亚洲侵略思想”的抬头

甲午战争后，以“亚细亚连带”为源头和主流的亚洲主义开始朝着“亚洲侵略”的方向不断逆转。这一时期，先是日本政界不断高唱“东洋盟主论”，试图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新秩序。尔后，民间的亚洲主义团体开始与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广为宣传以“日支保全论”、“东洋盟主论”为代表的亚洲侵略思想，日本社会的亚洲观就此发生全面逆转。

一、“东洋盟主论”的鼓吹及推行

对比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政界亚洲观的变化，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东洋盟主论”的确立。^①所谓“东洋盟主论”是指在甲午战争后由日本政界掀起，后波及蔓延至整个日本社会的侵略型亚洲主义理论，其核心是强调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轴心的新秩序。

当时，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大获全胜，认为本国已领先于曾经“老师”中国，具备担任“东亚盟主”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高涨。时为日本第一大党的自由党就率先发文表明这一决心：“日本为东洋文明执牛耳者，以鼓吹亚细亚革命而奋起。苟有阻我国前进者，应断然扫除。誓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先

^① 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1895-1945[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26.

称霸东洋，后驰骋世界。”^①随后，作为第二大党的改进党也在其官报《每日新闻》鼓吹“东洋盟主论”：“此次征服清国宣告东洋大局已定，先进之国为我日本矣，日本实乃当之无愧之东洋盟主。”^②此外，《东京日日新闻》、《万朝报》、《日本》等一批主流媒体也都陆续在其文章中表露了日本欲侵吞朝鲜、支那，称霸亚洲成为“东洋盟主”的欲望。时为内阁喉舌的《东京日日新闻》就曾露骨地表明日本欲合并朝鲜、分割中国的狂妄之心：“不可不取朝鲜之北、不可不取台湾之南，以此进逼清之中枢，东洋各部均收归于我，遂方能握一方之霸权，无惧于西洋诸国矣。”^③在朝野上下的鼓动下，对本国本民族的妄自尊大及对中华民族的极端否定充斥着公众舆论，一时间“东洋盟主论”在日本甚嚣尘上。而日本政府的这种自负心理也进而导致了民间对华观的全面逆转。这一时期，日本民众开始以“支那佬”、“猪尾奴”的称谓讥讽中国，甚至干脆直接宣扬起了“中国亡国论”。^④

除了在舆论上鼓噪“东洋盟主论”外，日本政府也开始调整其外交政策，在行动上与之积极配合。1895年4月，陆军总司令山县有朋（1838-1922）提出了一份军备扩充意见书，宣传：“欲使此次胜利为我帝国所承用，须设法扩张利益线。”^⑤而所谓的“扩张利益线”就是推进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⑥日本政府以此作为其“大陆政策”的核心，一步步朝着“东亚盟主”的目标进军。1895年10月，日本通过“乙未政变”^⑦暗杀了朝鲜的亲俄派势力，希望以此插手朝鲜内政，但因俄国的介入只得以失败告终。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并签订《日英同盟条约》，欲使列强承认其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特殊利益”，进一步在东北亚地区与强敌俄国形成对立。1905年，日本正式对俄宣战，并通过战争的胜利如愿获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南满洲铁路，达到了统治朝鲜的目

① 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M]. 東京：緑蔭書房，1996:6.

② 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M]. 東京：緑蔭書房，1996:6.

③ 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M]. 東京：緑蔭書房，1996:5.

④ 王美平.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2(1): 144.

⑤ 崔丕.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156 .

⑥ 沈予. 日本大陆政策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11-112.

⑦ 乙未政变又称王城事变、闵妃弑害事件，是指1895年10月8日（农历乙未年八月二十日）朝鲜王后闵氏（明成皇后）在汉城（今首尔）景福宫被日本浪人谋杀的历史事件。乙未事变的缘起是日本人未谋求重振在朝鲜的优势地位，因此暗杀了亲俄排日倾向的明成皇后。事后日本虽在朝鲜重建亲日政权，但由于掩盖工作不力，俄国亦趁虚而入，该事件只得以失败告终。就此，乙未事变也彻底激化了日俄矛盾，日本开始将俄国当作其在东北亚地区劲敌。

的。自此，借助甲午、日俄两战日本彻底解决了中国、俄国两个劲敌，在东北亚地区迅速崛起，成为了拥有台湾、朝鲜等多个海外殖民地或租借地的帝国。而“东洋盟主论”这一极具意识形态的主张也同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完成对接，成为了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政策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诱因和精神鸦片。

甲午战后，侵略野心逐步膨胀的日本政界试图通过“东洋盟主论”重构以日本文明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这种极具意识形态的宣传不仅激起和煽动了日本人民参战的热情，还进一步导致了民间亚洲观的逆转。自此，亚洲主义朝着侵略与扩张的方向不可逆地运转，并逐步沦为日本政府“大陆政策”下的理论工具。

二、东亚同文会与“支那保全论”

甲午战争前民间的亚洲主义尽管形式多样，但主流仍然是以兴亚会的“日清提携”为代表的亚细亚连带论。随着日本政界对“东洋盟主论”的鼓噪，民间对华观的基本认识也从过去的仰慕转为蔑视，并衍生出了一系列侵略型亚洲主义理论。这一时期成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提出的“日支保全论”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东亚同文会创立于1898年11月，它是甲午战后中日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后诞生的亚洲主义团体。比起亚细亚协会，同文会的成员结构比较复杂，吸收了大量像荒尾精这样从事谍报工作的保守分子，以及一大批宣传“文野之战”的新闻工作者。^①该会会长是近卫笃磨（1863-1904）^②，副会长为长冈护美，干事长为陆羯南（1857-1907）。其中还包括会员宫崎滔天、内田良平（1874-1937）、内藤湖南（1866-1934）、头山满（1855-1934）等。在东亚同文会的《规则》章程中，近卫笃磨、宫崎滔天、内田良平等骨干力量均认为，中日两国本是同文同种，如今中国面临危机难以自保，日本可以保护和启发中国，由两国“携手并进，保

^① “文野之战”是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企图用文明作为发动战争和后期宣传、美化战争的一种理论工具。通过诡辩“甲午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的义战，有利于推动中国进步”来宣传战争的合理性。最早由“脱亚者”福泽谕吉提出，后经德富苏峰、竹越合三郎等一批亚洲主义者宣传成了日本知识界的普遍性认知。此后，“文野之战”也成了日本政府用于发动对其他亚洲诸国战争和美化战争的有力武器。（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1895-1945[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15-17.）

^② 近卫笃磨（1863-1904）：明治末期著名政治家，曾担任贵族院议长一职，主张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近卫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中国问题，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近卫对列强在中国的瓜分充满危机感。围绕中国问题，近卫曾与康有为、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清朝重要官员有过密切的书信往来和会面，致力于提倡“支那保全论”和“朝鲜扶植论”。

全东洋”。^①因此，东亚同文会明确表示该会是以对华活动为主体的组织，其主要任务包括“保全支那”^②、帮助和改善“支那”、讨论研究“支那”实事以期实现等重要内容。^③其中，“保全支那”这一主张在民间亚洲主义的发展及日本对华政策问题上影响深远，而提出这一主张的“强硬派”领导人则是近卫笃磨。

④

当时，列强在甲午战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由此，日本学界对“分割支那”还是“保全支那”展开了讨论。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就主张激进的“分割论”，认为日本应该尽快加入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攫取东亚利益与西洋齐头并进。而东亚同文会一派的近卫笃磨则从“协调制衡”的角度提出了“保全论”。近卫认为，目前列强虽在嘴上虽欲瓜分中国，但实则都想维持中国领土现状以求相互牵制，故日本可顺其势“保全支那”。这样一来，既可找到日本插手中国事务的大义名分，又可寻机与列强尤其是英国等保持协调。^⑤1898年11月，近卫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便毫不掩饰地说到：“欧洲列强为自身利害，皆在东洋相争。然东洋乃东洋之东洋。东洋人不可不有独决东洋问题之权利。美洲门罗主义，不外乎此意。因而，在东洋实现亚洲门罗主义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⑥在近卫看来，为使中国不落入欧美帝国之手，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国家应该主动承担起“保护”中国的义务。而完成这种义务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模仿美国的门罗主义，将中国事务全权交由日本处理。显然，近卫的姿态，虽名为保全，实则是贪图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① 翟新. 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理念 ——以东亚同文会的“中国保全”为中心[J]. 上海大学学报, 2006(2): 33—34.

^② 国内外学者对“支那”一词有语言学、民族学、地理学等观点，但至今还没有定论。据杨鹏、孟玲洲介绍，“支那”这个词是古代印度对古代中国的称呼，起源于朝代梵语佛典的“cina”的音译。后来，“支那”一词随着佛教的迁入进入日本。在17世纪以前，只用于佛经，没有负面意义。但到了19世纪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用“支那”来广泛地称呼中国，并逐渐包含轻视中国的负面意义。不过，对于宫崎滔天这类亚洲主义者来说，使用“支那”一词是绝无蔑视的含义，仅仅是出于通俗习惯。因而，本文在论述时均直接引用原著中“支那”一词，但在间接引用时将全部置换为“中国”。

^③ 小路田泰直. 日本史の思想：アジア主義と日本主義の相克[M]. 東京：柏書房，1997：144.

^④ 狭间直树著 张雯译. 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50—151.

^⑤ 翟新. 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理念 ——以东亚同文会的“中国保全”为中心[J]. 上海大学学报, 2006(2): 33—34.

^⑥ 刘峰.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6(4): 53—59.

其本质就是将中国事务全权交由日本的亚洲式“门罗主义”。^①正如后来梁启超所言：“日本动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闻此言……言保全人者，是谓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谓放弃自由。”^②足以见得，“保全论”虽未像“分割论”那样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但在攫取中国利益这一点上二者并无分别。因而，“支那保全论”就是典型的“侵略型亚洲主义”理论。

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企图以东洋盟主身份独占中国利益的想法破灭，这一时期东亚同文会所倡导的温和型“日支保全论”逐步占据舆论上风，尤其是其中竭力避免与欧美出现正面对抗的构想正符合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由此，东亚同文会等亚洲主义组织也在此时为日本官方所重视，成为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在民间鼓吹侵略扩张思想的幕后推手。此后，东亚同文会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扮演着为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角色。1901年，该会以专务“中国学”为名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专注情报搜集、间谍培养等工作。据统计，书院的46余名毕业生大都成了后来日本大陆扩张的“先锋、骨干”成员。^③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东亚同文会也有不少成员是出于赤诚之心援助中国革命，譬如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他们以东亚同文会成员的名义来到中国，但却始终坚守着与政府相违的个人信念，本着人道主义和“亚细亚连带”的真诚心愿与中国革命安危与共，有时甚至还直接站在了日本政府的对立面。

至此，以甲午战争为分水岭，民间的亚细亚团体已完全脱离“亚洲连带思想”，与政府侵略扩张的亚洲观走向一致。与此同时，这些团体也在行动上积极配合着政府推行的“大陆政策”，为日本的对外扩张寻求“合乎天理”的依据。

第二节 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成熟

甲午战争后，民间盛行的亚洲主义与政府主张的侵略主义逐渐合流，而过去拥护“日清提携”的亚洲主义者亦纷纷转向这一思想的对立面，扩张成了官民一致的共识。在亚洲主义急遽右转之际，宫崎滔天却真诚的守护着亚洲连带思想并积极援助中国革命。在此期间，滔天的思想也趋于成熟，开始带有鲜明的个人特

^① 章永乐. “门罗主义”话语的跨洋旅行——亚洲主义、省域空间与“旧邦新造”进程[J]. 学术月刊, 2020(7): 4.

^② 梁启超. 保全支那[N]. 清议报, 1899-12(33).

^③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0.

征，展现出与其他亚洲主义者与众不同的一面。

一、反政府反侵略的鲜明立场

同当时东亚同文会其他成员一样，宫崎滔天起初也坚决地站在“日支保全论”的阵营，认同甲午战争是为“帮助朝鲜独立，维持东洋的和平”的“义战”。^①因而，面对甲午战后持续动乱的东亚局势，宫崎滔天认为日本应该继续承担起“保护中国”的义务，并以此增加两国人民的亲密度，从而加强亚洲连带的可能性。

不过，宫崎滔天赞同“日支保全论”的想法并未持续多久，在看到战后日本政府并未对“东洋进步”、“日清联合”作出实际行动后，宫崎滔天立即对战争发出了深刻反省：“日清战争实乃天道公义之战，但是对于这个战争结果我却不由得冷汗一惊。我们同清国乃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如今清国面临亡国之势，我国人岂能袖手旁观。更让我惊讶的是，当时战争时我国人的各种呼声，诸如为东洋之和平，为清国主权的保护等等如今却销声匿迹。呜呼！我那庙堂上的诸公对于清国主权一事的保护竟是毫无作用！”^②在宫崎滔天看来，日清两国本是同文同种、手足之情，但日本政府在战后却毫无作为，因而滔天对日本政府大感失望。

在认清日本政府并非“保全清国”的真正意图后，宫崎滔天一改过去对日本政府态度，对其展开了强烈批判。1899年1月，滔天向《九州日报》连续寄稿，怒斥日本政府对东洋现状的不作为。宫崎滔天提到：“在甲午战争之前，我们是一个弱小落后的岛国，而在甲午战争之后，我们是一个贪婪傲慢的残暴国家！”^③在看穿日本政府“支那保全”的虚伪后，他也开始对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展开深刻反思。宫崎滔天指出，所谓“文明之国”的日本实则是“野蛮之国”，因为其军备扩张和战争野心在甲午一战后早已暴露无遗：“人或曰，现今之社会乃文明之社会。而兵器机械新造发明，学艺进步之同时，兵备军事亦日益扩张，以致日后战斗只会愈极惨烈。以吾之言，今之文明实乃彻彻底底的野蛮性文明也。”^④显然，宫崎滔天是站在中国等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对日本展开批判，他真诚的

^① 宫崎滔天. 暹羅國王來遊の噂に就て.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東京: 平凡社, 1971—1976: 83.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東京: 平凡社, 1971—1976: 427.

^③ 宫崎滔天. 暹羅國王來遊の噂に就て.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東京: 平凡社, 1971—1976: 88.

^④ 野村浩一著 张学锋译.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139.

守护着“亚细亚连带”的心愿，与甲午战后转向“东洋盟主论”的其他亚洲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嵯峨隆所说：“甲午一战后，宫崎滔天的反政府反侵略的亚洲解放思想在最后关头避免了与国权主义的结合。”^①自此，宫崎滔天思想中反政府反侵略的基调逐步定型，使其在亚洲主义群体中成为了独树一帜的存在。

在此后的革命道路上，宫崎滔天也依旧坚守着“反政府反侵略”的思想阵地。日俄战争后，面对日本频繁掀起的“主站论”，宫崎滔天在其主办的《革命评论》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反帝反战宣言。在《中国革命与列国》一文中滔天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指出：“所谓帝国主义就是吞并主义。因帝国主义所需军备扩张之钱财课税均出自平民，而帝国主义所需之征伐战斗牺牲者亦皆为平民。然尔等平民由此间得以何种好处？只能嘲之苛捐杂税外一无所获。”^②宫崎滔天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本质，指出这种扩张实际就是对平民的压迫。后来，一战期间日本加紧军备扩张之时，宫崎滔天也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军国主义发出了强烈谴责：“隐藏在政府军备扩张背后的是对国民的压迫。而被课以重税的大多数是细民、佃户，这些繁重不堪的苛捐杂税足以彻底击垮他们。”^③

自甲午战争后，亚洲主义经历了从“连带”到“侵略”的急遽右转。在众多亚洲主义者以“义战”、“文明之战”掩盖侵略事实，贬低和污蔑中国之时，宫崎滔天却毫不犹疑地站在反政府反侵略的立场，对东洋的未来发出深刻警醒。在对战争的反思和政府的批判中，宫崎滔天对“亚细亚连带”的真诚和坚定也推动着他的革命道路由理想迈入现实，从而展开进一步的亚洲连带行动。

二、从“支那”到“世界”的革命构想

宫崎滔天自甲午战后便认定日本所谓的“文明”实则是“欺人之虚言”，“日本政府对东洋现状毫无作为”。^④在这样的心理驱动下，宫崎滔天对母国的无力和控诉推动他内心朝着“支那问题”和“支那革命”的方向发展，从而进一步展开了其“支那革命主义”的具体实践。尔后，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宫崎滔

^① 嵯峨隆. 宫崎滔天とアジア主義[J]. 国際関係. 比較文化研究, 2016 (3): 136.

^② 王晓秋. 《革命评论》与同盟会[J]. 北大史学, 2007 (1): 137.

^③ 宫崎滔天. 東京通讯.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 平凡社, 1971—1976: 255—256.

^④ 野村浩一著 张学锋译.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138.

天的思想也从“支那革命”实现了向“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展望，其“世界主义者”的形象被更加鲜明地描绘出来。

从1896年开始，宫崎滔天结识了犬养毅（1855-1932）^①等人，后经由其斡旋，陈少白介绍，终于在1897年7月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中国革命友人孙中山。第一次会面后，革命理想和革命道路的一致性便使得二人立刻结为了亲密同志。宫崎滔天认定孙中山便是能实现“支那革命主义”的大人物，进而开始全力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积极斡旋于日本政界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由此，宫崎滔天也正式开始了其“支那革命”的具体实践。

当时，以义和团运动为开端，在轰轰烈烈的反清运动下形成了许多新兴的革命团体。宫崎滔天认为此时正是促成革命的大好机会，若能以此机“使（康有为）结孙党，暗通两广哥老会、福建三合会诸会”^②，革命必定大有反响，适时将会迎来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解放。因而，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宫崎滔天就曾多次从“武力”出发劝说康有为，希望康有一派能同革命党人联合“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于中原，以流血扫积弊”，^③在中国掀起一番革命事业，进而连带亚细亚诸国抵御欧美列强，以恢复亚洲往日的隆兴。但是，宫崎滔天不知他所谓的“流血扫积弊”正言重了维新派等人的弱点。康有为拒绝了滔天的提议，甚至将其污蔑为清廷派出的“间谍”。^④在第一次联合行动以失败后，宫崎滔天开始将目光转向了革命派之间的大联合，希望能由他们在中国掀起一番大事业。从1899年秋冬开始，在宫崎滔天的撮合下，由毕永年、陈少白等人协助，“三合会，兴中会，哥老会三个团体合一”，拥孙为总会长，兴办“忠和堂兴汉会”，^⑤兴汉会就此成立。与此同时，宫崎滔天也开始积极接触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以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据滔天的夫人追子回忆，自1900年以后，在日留学的黄兴、汪兆铭、张继、宋教仁以及何天炯等人都相继来到滔天家中赴宴，共谋革命事

^① 犬养毅（1855—1932）：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政界元老。日本第29任首相。早前参加西南战争并加入了立宪进步党，由此活跃于日本政界。一直以来，犬养毅都对中国事务格外关注，宫崎滔天、平山周等东亚同文会成员亦长期受其资助。宫崎滔天赞赏犬养毅是“侠义之士”，尊他为“精神上的重生父母。”

^② 赵军. 宫崎滔天与兴中会[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2(5): 44.

^③ 童显勋. 宫崎滔天与近代中国革命[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 1988(3): 95.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121.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427.

业。^①他们通过滔天结识了孙中山，成为了革命挚友，革命派的队伍日渐壮大。

在促成革命派之间的大联合后，宫崎滔天便开始着手准备协助兴汉会在长江流域进行起义活动。1899年，为协助孙中山支援菲律宾独立军运动，宫崎滔天委托日本方面购得共计六万五千元的军火，及时解决了革命派武器匮乏的问题。^②1900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决定在惠州发动起义。宫崎滔天又立即协同内田良平等人招募了东亚同文会、玄洋社、黑龙会的四十位成员援助革命。他们在东京和福冈为革命派募集到了大量军费，得到了诸如九州筑丰煤炭的慷慨资助。^③另外，1900年6月，宫崎滔天还作为革命派代表与清政府相谈“两广独立”事宜，此次广州之行也收获了李鸿章方面共计3万元的资助。^④自1898年来到中国以后，宫崎滔天便积极践行着“支那革命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此期间，滔天不仅在促成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上发挥着积极影响，还在筹集军饷、武器采买等事宜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中国的革命运动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同年，日俄战争结束。当战争继续推动“东洋盟主论”在日本甚嚣尘上之时，一些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⑤和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内村鉴三）^⑥的非战论也引发了不小反响。而俄国革社会革命党首领尼古拉·拉塞尔等人先后到访日本，在当时的日本社会更是轰动一时。从中国、日本再到俄国，一切转变都在证实着在武力冲突之下革命的风暴正由远东推向世界。^⑦值此时局转换之际，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活动也进入了划时期的转变，其思想中以“支那革命”为基础，进一步向“世界革命”展望的意识开始有了清晰的版图。

^① 针生清人. 宫崎滔天の支那革命の思想[J]. 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 1978 (3): 22.

^② 赵金钰.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16.

^③ 山口光朔. 宫崎滔天のアジア主義一大陸の一類型[J]. 桃山学院大学纪要, 1963 (2): 19.

^④ 赵金钰.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17.

^⑤ 幸德秋水(1871-1911):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曾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并于1901年创立社会民主党。在日俄战争前夕，幸德积极从事反战活动，组织平民社，创办《平民新闻》。战后逃亡美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1910年，日本的反动政府策划“幸德秋水事件”，诬陷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意图刺杀日本天皇，幸德秋水因此被捕身亡。在“幸德秋水事件”的影响下，宫崎滔天及宫崎民藏创办的“土地复权同志会”也遭到日本政府查封，只得被迫解散。

^⑥ 内村鉴三(1861-1930): 日本基督教思想家，无教会主义的倡导者。随着日本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内村鉴三演进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内村鉴三以基督教的普世原则批判对甲午战争(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展开批判，其思想吸引了包括宫崎滔天在内的日本一大批青年学生。

^⑦ 野村浩一著 张学锋译. 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134.

1906年,为助成中、俄两国实施革命、改变政体,并同时声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创办了日文刊物《革命评论》^①。以《革命评论》为理论战场,基于当时革命浪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宫崎滔天提出了关于“世界革命”的一些构想。在《中国革命与列国》、《中国革命之大势》两文中,宫崎滔天对“列强干涉支那革命”这一不安言论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一现象并非中国亡国之兆,更有可能是引起“世界革命”的导火索。宫崎滔天提到,“若列强果有干涉支那革命之意亦不足为惧”,适时“革命军只需退于支那内地,采取旷日弥久之策”,^②因为“列国干涉支那革命必会引起世界革命大动乱”,到时将会迎来“国家帝国主义与社会革命、世界主义主张的大决战”。^③最后,滔天还在文末表达了对“世界革命”的美好愿景,他坚信“宇宙之间将会建立新的纪元,未来世界都是自由民权之国”。^④虽然,宫崎滔天在这里对“世界革命”展望还很模糊,但是亦能从中窥见其“在支那建立根据地,等待列强互相争斗并爆发世界革命”的基本设想。正如野村浩一的分析:“如果夸张地说,滔天在展望中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与期待欧洲革命的列宁、托洛茨基处于同一水平层次的。”^⑤

至于“世界革命”的道路选择问题,宫崎滔天当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1907年3月,宫崎滔天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革命问答》一文,专门回复读者对革命的诸多疑问。在《革命问答》中提到:“有人问任何事物的都有终点,那么革命的终点是什么呢?”宫崎滔天回复:“革命的最终目标将会在无政府主义,无社会主义,抑或是共产主义间抉择”。^⑥在当时的宫崎滔天看来,无政府与共产主义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结点。只是不知未来世界进步的结果究竟是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显然,对于二者的道路选择问题滔天仍存在较大疑虑,但后来认识到“毁灭人的自由性的共产主义制度,绝对不是人应该

^① 1906年8月,宫崎滔天邀请萱野长知、青藤幸三郎、池亨吉、青梅敏雄在东京创办了日文刊物《革命评论》。《革命评论》的创办是为与《民报》相呼应,并同时宣传中国和俄国的革命。《革命评论》专辟有“欧洲革命大势”、“中国革命大势”、“志士风骨”、“东亚纪事”、“革命风流”专栏。另外,为宫崎滔天宣传“土地平均主义”思想,每期另附两页“土地复权同志会纪事”。(章开沅.宫崎滔天与《革命评论》[J].文物,1983(3):42.)

^② 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东京:平凡社,1971—1976:608.

^③ 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东京:平凡社,1971—1976:608.

^④ 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东京:平凡社,1971—1976:609.

^⑤ 野村浩一著 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35.

^⑥ 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东京:平凡社,1971—1976:610.

定居的地方”的他实际上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①过去，宫崎滔天和宫崎弥藏虽然在“支那革命主义”中表达过其“世界革命”的愿望，但是二人也只是粗略设想并未从现实角度分析相关可能性。然而，在历经中国革命的实践及受当时世界格局的影响后，宫崎滔天开始对“支那革命”到“世界革命”的构图有了更为清晰的构想。

甲午战后，当“东洋盟主论”在日本甚嚣尘上，民间亚洲主义理论与政府对外扩张路线走向一致时，宫崎滔天却站在被压迫亚洲民族的视点上对此发出了清醒批判，其思想内涵中反政府反侵略的一面日益凸显，进而塑造了他与其他亚洲主义与众不同的一面。尔后，在对日本政府的失望和“支那革命主义”的驱动下，滔天怀揣着“亚细亚连带”的真诚心愿滔天来到了中国，由此展开了其亚洲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化和世界形势的变幻，宫崎滔天思想中关于“支那革命”到“世界革命”的构想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展望，其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亚洲主义者形象日渐清晰，进一步凸显了他在亚洲主义群体中的独特性。由此，围绕“支那革命主义”这一立论基础，反政府反侵略的主张和“世界革命”的构想在宫崎滔天式亚洲主义的构图中并行延伸，推动其“亚细亚连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第三节 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展开

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宫崎滔天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其“支那革命主义”的实践中。在此期间，伴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曲折迂回，滔天的革命行动及革命角色也出现了迁移和转变。甲午战争后，宫崎滔天先是以情报刺探专员身份活动在中国革命党人之间，惠州起义后革命家滔天却又成了隐士的浪曲说唱家，而同盟会成立后他又再度回归革命成了驻东京本部的重要成员。在复杂多变的角色转换中宫崎滔天也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性格与经历，使他成长为一名非典型的亚洲主义者。

从1896年开始，宫崎滔天同其他大陆浪人一样，以依附关系跻身到了日本资产阶级内部。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日本陆续派出了许多大陆浪人前往中国寻找反清志士，希望借帮助他们成立一个革新政府伺机插手中国政务。当时所属东

^① 渡辺京二. 評伝宮崎滔天[M]. 東京：大和書房 1976 : 279.

亚同文会的宫崎滔天正是日本派出的联络员之一。在这样的契机下，滔天先后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批“见识卓越，抱负不凡”的革命志士。^①1897年11月开始，孙中山前往宫崎滔天的老家暂居。这一时期，宫崎滔天开始翻译孙中山流亡英国时写下的著作《伦敦蒙难记》，并以“支那革命党领袖孙逸仙”为题刊载在《九州日报》上，面向日本国内宣传其革命思想。^②之所以对孙中山有着如此爱慕之情，不仅是因为滔天钦佩孙的为人，更是因二人在革命道路和革命志向上的高度一致。孙中山主张“兴起革命军”^③，开展武装斗争。这与宫崎滔天“支那革命主义”中的使用暴力手段完成革命相契合，此为其一。其二，孙中山认为“唯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其余问题及迎刃而解矣”，^④这同滔天的“亚细亚命运转折点实系中国之兴亡”^⑤也是相吻合的。二人都将中国的盛衰看作亚洲兴盛的关键性因素，并希望先以中国为根据地开展革命。其三，宫崎滔天和孙中山的革命基础都是立于“世界人道，黄种人权利”之上。滔天主张以“世界革命为最终归宿”，而孙中山亦提出“亚洲黄种，世界人道，天下苍生为吾所愿”。^⑥显然，两人思想中都带有“人类同胞”、“世界公民”的共同基因。

除孙中山外，宫崎滔天还与黄兴、宋教仁、何天炯等革命志士结下了深厚友谊。1902年，宫崎滔天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三十三年之梦》在《二六新报》上连载，其中详细介绍了他与孙中山的交往及兴中会的相关情况，在留日学生中引发了较大反响。黄兴、胡汉民、何天炯等人都相继慕名而来，称此书是“鼓吹革命的有力著述”，而宫崎滔天则是“最大的侠客”。^⑦滔天也很看重这些留日学生，称之为“佳宾珍客”，^⑧并介绍孙中山与他们相识，成了沟通革命派之间的桥梁与媒介。后来，在黄兴、蔡锷患病期间，宫崎滔天还介绍了日本医生为其治病，并收养了黄兴儿子黄一欧。1906年，宋教仁患病期间也曾寄居在宫崎滔天家中两月有余。虽然，一直以来宫崎滔天是以日本政府资助的刺探情报专员身份活动在中国革命党人之间，但他本人却始终坚守着与政府相违的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21.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23.

^③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74.

^④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1：533.

^⑤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

^⑥ 何燕侠. 试论宫崎滔天与孙中山关系的特点[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5）：45.

^⑦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编辑组.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四辑[A]，北京：中华书局，1982：90—91.

^⑧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0.

个人信念。与援助中国革命带有政治投机成分的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人不同，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不单单是建立在“亚细亚连带”的真诚心愿上，更带有一种博爱平等的思想底色。因而，宫崎滔天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帮助，不是以某种个人私欲或是他人指使的阴谋活动为基础，而是一种建立在完全自觉意识上的崇高理想。

但是，援助中国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也经历了挫败与彷徨。惠州起义失败后，宫崎滔天因武器运送一事有同犯嫌疑，备受东亚同文会内部诘责。1901年1月，由犬养毅出面，宫崎滔天、内田良平等人到会为此事调解。^①谁料，会上滔天与内田又因“布引丸事件”引发口角，内田投碗中伤滔天，二人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其实，“布引丸事件”只是宫崎滔天与东亚同文会成员产生分歧的导火索。长久以来，东亚同文会所强调的是以日本一国利益为轴心的“日本盟主论”，其对华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攫取政治权力，与主张“亚细亚连带”的宫崎滔天有着根本区别。故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滔天也在惠州起义后主动与内田一派划清界限。而东亚同文会也取消了宫崎滔天所在广东支部，将其从同文会除名，宣告停止对中国革命派的支持。^②就这样，在政治上接连受挫的宫崎滔天陷入了彷徨和迷茫，选择了暂别中国革命的舞台。

1902年，生活潦倒的宫崎滔天拜当地颇有名望的浪曲家为师，着手以表演浪曲^③自谋生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品类庞杂的曲艺形式中浪花节的地位卑不足道。但生活早已穷困不堪的宫崎滔天为何选择以此维生呢？据台湾学者阮雯娜的研究，浪花节这种说唱艺术对明治十年之前的自由民权运动有着重要意义。19世纪末，因自由民权运动的迅猛之势，日本政府于1880年下达了限制演说禁令。自由民权运动中的豪杰志士只得转战浪曲小屋，转而以说唱的形式向大众宣传自由平等的政治理念。因此，浪曲不仅是自由平等的象征，也是侠士、志士的代表符号。^④由此来看，宫崎滔天成为一名浪曲家并非是逃避现实的无奈之举，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继续坚持自己的革命信念。长达六年的浪曲表演经历也

^① 赵金钰.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6.

^② 中村哲夫 谢俊美. 孙中山与东亚同文会[J]. 历史教学问题，1994（2）：35.

^③ 浪曲又被称作浪花节，是一种说唱艺术样式。浪曲通常由三味线来进行伴奏，多以男女情爱、侠客传奇以及历史及战争故事为主题，在明治日本曾风靡一时。

^④ 阮雯娜著、刘超译. 文士、浪人、说唱传统及近代中日间的文化互动：以宫崎滔天为个案[J].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10）：484.

给宫崎滔天创作带来了诸多灵感。从1903年6月开始,滔天长达两百回的《新浪花节·慨世奇谭:明治国姓爷》在当时号称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二六新报》上分期连载。《新浪花节·慨世奇谭:明治国姓爷》以故事小说的形式,融入宫崎滔天自身的现实经历,讲述了明治时期下级武士铁男的冒险经历。少年铁男遇到了中国人孙后深受其“四海一家”的国际主义观念影响,理解到了亚洲各国荣辱与共的道理,从一个民族主义者转变为了亚洲主义的忠实拥趸。显然,这个以浪花曲形式创作的文学作品深刻地寄托了宫崎滔天“亚细亚连带”的现实理想。他在书中也多次暗示读者要想振兴亚洲就必须放弃所谓的民族主义立场,坚持以亚洲联合为最终行动方向。而这样的宣言正好对当时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东洋盟主论”提出了强有力挑战。^①

1905年7月,因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不顺,孙中山等人回到了日本东京,听闻这一消息的宫崎滔天立刻前往码头迎接孙中山一行。同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宫崎滔天等8人^②因协助革命党有力被破格纳为中国同盟会成员。由此,宫崎滔天再度回归到“中国革命”的舞台。这一时期,除协助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基本工作,滔天也扮演着调节同盟会成员内部分歧,承担中国南方起义武器补给的角色。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二人因国旗设计一事发生矛盾。^③期间,本“积极”援助中国革命的平山周、北一辉等人却在此次风波中推波助澜,试图分裂革命党人。以致孙中山在离日后寄与宫崎滔天的信中大失所望地谈到:“平山、和田(指1907年反孙风潮中的部分日本友人)等不顾公义,为弟所不料。故此后不复信任此数人,日本之运动,宜秘密行事,不特使平山、北、数子闻之,即便本部中人亦不必商议。”^④但是,作为孙派成员的宫崎滔天、何天炯并未因此次风波疏离黄派,挑拨同盟会。1907年3月9日,宫崎滔天为调和孙、黄矛盾于

^① 阮斐娜著、刘超译. 文士、浪人、说唱传统及近代中日间的文化互动:以宫崎滔天爲个案[J].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10):484.

^② 据杨振华的《日籍会员在中国同盟会中的积极作用》《日籍会员在中国同盟会中的破坏作用》《日籍会员对中国同盟会的影响》可知,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日本人共有8人,他们是宫崎滔天、内田良平、末永节、平山周、北一辉、萱野长知、和田三郎和清藤幸七郎。后这8位成员大都加入了宫崎滔天创办的《革命评论》社,帮助积极宣传同盟会,支持其革命工作。

^③ 指第一次反孙风潮:当时,孙黄二人因国旗设计问题发生口角。风波后的几天孙中山便因日政府的驱逐带领部分粤系骨干成员离日南下。孙中山一行离开时因经费问题接受了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两笔资助,但因时间紧迫并未告知同盟会其他成员,故激起了章太炎、黄兴等内部成员的诸多不满,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反孙风潮。

^④ 中华书局.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1981:342-343.

城郊风乐园设宴，出席者皆为与孙有隔阂的同盟会成员，诸如章炳麟、黄兴、宋教仁、张继等人。^①期间，何天炯主动与黄兴一同题诗作画，并同宋教仁坐谈良久。虽然，宫崎滔天因言语不通，未能积极参与他们之间的沟通。但应当看到，宫崎滔天对调解同盟会内部矛盾及给予革命同志友情安慰起到了关键作用。

同年，同盟会的活动进入武装起义阶段。这一时期，因不复信任其他日本友人，孙中山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全权交由宫崎滔天处理，而滔天则在承担枪械运输和信息联络等工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1907年孙中山离日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宫崎滔天多次参与革命的起义工作，奔走于日本商界、政界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1907年夏、秋广西防城、钦州起义期间，通过宫崎滔天斡旋接洽，同盟会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支、每支配子弹600发。^②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4月云南河口起义等，均是由宫崎滔天负责日本方面的器械运送和军饷筹备等工作。^③

虽然，在亚细亚连带行动的展开中，宫崎滔天的角色伴随着革命的波澜起伏经历了多重历史演变，经历了社会活动家、革命思想家、浪曲艺术家的身份转换，不停辗转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二律背反世界中。但是，在这之中宫崎滔天从未有过放弃革命和逃离中国的想法，其行动和思想在亚洲主义的群体中展现出了很强的一贯性，成为了其中独树一帜的存在。正如卫腾沈吉的评价，在“千差万别的亚细亚主义”中，宫崎滔天是一意孤行的“堂吉诃德式”亚洲主义拥护者。

④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88.

② 李长莉. 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J]. 近代史研究，2012（3）：74—75.

③ 李长莉. 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J]. 近代史研究，2012（3）：74—75.

④ 衛藤沈吉. 滔天と清国革命はどうして結びついたか[J]. 思想，1968（2）：33.

第三章 亚洲主义的狭路与宫崎滔天思想的调整

一战以后，侵略型亚洲主义的理论根据进一步强化，内容进一步充实，异化为“大亚洲主义”。而亚洲主义团体也被右翼势力取代，一路右倾狂泄，走向法西斯化。至此，亚洲主义彻底陷入了侵略与扩张的狭路。在亚洲主义急遽右转和东亚关系日趋冷淡之际，宫崎滔天的思想也经历了挫折和调整，并在对亚洲主义的脱离和复归中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第一节 一战后“亚洲侵略思想”的强化

一战期间，东亚局势风云变幻，欧美列强因卷入战争无暇东顾。值此良机，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亦蠢蠢欲动，提出了一系列所谓“指导”、“改造”中国的理论。虽这些主张各具特色、形态相异，但在本质上却是共通的，即它们都以扩张帝国主义利益为核心，彻底放弃了亚洲主义中“平等提携”的内容。是故，这一时期的亚洲主义也被称为“大亚洲主义”。当“大亚洲主义”以压倒性趋势席卷日本政坛时，亚洲主义组织也彻底异化，他们同“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在东北亚地区掀起了一系列的国权扩张运动。

一、“大亚洲主义”的出台及实施

1916年11月，小寺谦吉（1877—1949）^①撰写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出版，标志着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正式诞生。^②同近卫笃磨等人一样，小寺也是通过“同文同种”、“日本天职论”等原理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美化成所谓的“保全”和“改造”，其最终目的都是在为日本担当“东洋盟主”寻求合乎天理的依据。

^① 小寺谦吉（1877—1949），日本神户人。曾留学美欧，亦精通汉学。回国后活跃于政坛，从1908年起六任众议员，1930年转入商界，后1947年曾出任神户市长。

^② 戚其章.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J]. 历史研究, 2004(3): 144.

小寺认为，战后的世界格局将会以黄白人种的竞争为主，并认定“黄白人种必然会围绕远东地区展开武力角逐”，^①而是否在中国占据优势地位将是这场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故，小寺提出，为使中国在日后免于白种人的威胁压迫，作为东亚文明传承者的日本有责任“指导和改造”中国，“成为黄种人的盟主与领袖”并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②而作为落后国的中国则必须接受日本在各领域的全方位改造，才能实现“支那的保全及东亚永久的和平”。^③显然，同“东洋盟主论”一样，小寺的“大亚洲主义”也是在利用“东西文明相对抗”、“人种竞争”等论调为日本所谓的“改造”埋下伏笔。

随后，小寺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日本将如何对中国进行改造。小寺认为，在政治上，中国需从日本招聘大量顾问，分配到地方行政以协助中国展开自下而上的彻底改革。在军事上，中国应主动放弃国防，将领土保护和主权独立的责任全权交由日本。在经济上，中日须合办经营，尤其是在涉及煤矿、铁道等国民经济领域上。最后，社会教育上，中国须聘用日方教育人员并改革文字采用“日本假名”。^④不难看出，小寺谦吉以“支那保全与改造”为核心的大亚洲主义其真实意图就是将中国全面同化，使之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都从属于日本，直至中国完全沦为成为日本的附庸。因而，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其本质就是一套扩张日本权益的侵略理论。一战以后，以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论”为代表，亚洲主义彻底陷入了侵略扩张的狭路。这一时期侵略型亚洲主义思潮蜂拥迭起，如德富苏峰的“亚州门罗主义”，浮田和民的“新亚细亚主义”以及北一辉的“大亚细亚主义”。上述主张虽在措辞上有所分别，但在坚持日本侵略扩张的本质上是完全相通，尤其是在否定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强调“东洋盟主论”等基调上如出一辙。

不过，在“大亚洲主义”逆流肆虐横行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股游离于这一侵略扩张思想以外的主张，即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支那革命主义”。一战期间，宫崎滔天以政治活动家积极奔走于日本政界和商界，希望“能得益于日本的政治势力”，以扶持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并趁此机会将“亚细亚联盟发展出一个

^① 小寺謙吉. 大亜細亜主義論[M]. 東京：宝文館，1916：6.

^② 小寺謙吉. 大亜細亜主義論[M]. 東京：宝文館，1916：12—13.

^③ 小寺謙吉. 大亜細亜主義論[M]. 東京：宝文館，1916：13.

^④ 小寺謙吉. 大亜細亜主義論[M]. 東京：宝文館，1916：13—17.

基础”。^①但是，在“大亚洲主义”以压倒性姿态占据日本舆论的局势下，宫崎滔天的“亚细亚连带”理想只能随之化为泡影。伴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不断推进，“大亚洲主义”彻底放弃了“亚洲主义”中“平等提携”、“抵御列强”的连带思想，并逐步与日本的军国主义融为一体，继续以所谓的“联盟”、“指导”形式表现出来。譬如此后，大川周明（1886-1957）的“大东亚秩序建设论”、石原莞尔（1889-1949）的“东亚联盟论”以及侵华战争期间的“大东亚共荣圈”^②。在日渐成熟的大亚洲主义话语体制下，孤注一掷的日本也被彻底推向了战争的深渊。

二、黑龙会与国权扩张运动

当“大亚细亚主义”在日本甚嚣尘上之时，亚洲主义团体亦马首是瞻，沦为该主张的有力鼓吹者。它们作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民间政治势力，打着防止中国被瓜分的旗号，积极配合政府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围绕朝鲜和中国掀起了一系列的国权扩张运动。^③

步入 20 世纪以后，黑龙会成了这一时期活跃于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要亚洲主义团体。黑龙会继承于日本右翼团体鼻祖“玄洋社”^④，于 1901 年 1 月宣告建会，创始人作为日本右翼头目内田良平等人。黑龙会的成立与所谓的“三国干涉”事件有关。当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尝到了侵略的甜头，然而“三国干涉还辽”却给正处心积虑推行扩张政策的日本当头一棒，以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激进派为首的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92.

^② 孙立祥.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36-37.

^③ “国权扩张运动”是右翼为了占领朝鲜、侵略中国、称霸世界，实现“大陆扩张政策”的战略、战术。右翼国权主义扩张运动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的国权主义运动包括干涉选举和反对修改条约运动。右翼对内策划的这两个国权主义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日本军国主义化，促成政府扩军备战，试图占领朝鲜、中国进而与列强争霸世界。右翼对外的国权主义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俄国、朝鲜和中国。中国方面，日本右翼主要是采取投机策略，借中国民主革命之机，试图建立亲日派政府。但无论是支援中国革命党投身中国民主革命还是后期分化革命党破坏革命，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日本扩张的国家利益服务。（参见：吴限. 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35-137.）

^④ 玄洋社成立于 1882 年，是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被认定为“标榜和实行‘大亚细亚主义’的有力团体”。同当时的其他亚洲主义组织一样，受自由民权运动和亚细亚连带论的影响，右翼政治领袖头山满以“伸张民权”为初旨创立了玄洋社。但不同于早期亚洲主义提倡“平等提携”的观念，头山满所倡导的亚洲主义是以“尊皇论”和攘夷论为支柱，追求“皇道布达于世界”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因而，玄洋社是一个以“天皇中心”及“国权主义”为基本原则的侵略性组织。（参见：孙立祥.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30-37.）

浪人群体更是鼓噪“此乃吾国千古未有之奇耻大辱矣”。^①由此，内田良平等人决定成立一个对俄强硬组织，以统一领导他们在东北的谍报活动。至于以“黑龙”为名，是因其成员认为日俄之间将围绕黑龙江一带展开利益争夺，所以他们将扩张的首要目标定在了黑龙江。^②黑龙会成立后，虽在纲领文辞上竭力以“文化”、“亲和”、“改革”等词矫饰做作，但其奉行的根本宗旨仍然是“以天皇为元首，实现帝国隆兴与民族繁荣”的极端国权主义。^③因而，从本质上来说，黑龙会是一个是以“天皇中心”及“国权主义”为基本原则的侵略性组织。此后，在以“伸张国权”为核心的思想指导下，黑龙会积极配合日本政府在东北亚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权扩张运动。

1901年，在宫崎滔天引荐下内田良平结识了孙中山，由此开始了黑龙会以“援华”为名目的“国权主义”运动。结识革命党人以后，因希望借援助中国革命之由为日本在满蒙地区谋求利益，黑龙会曾一度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5年，在内田良平协助下于东京赤坂黑龙会总部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北一辉以及当时以浪人身份活动的宫崎滔天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加入了同盟会。他们积极奔走于日本政界和商界，协助同盟会解决资金匮乏、武器运输等问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黑龙会立即组织了浪人团体参与武汉保卫战，并在舆论方面给予了中国革命大力支持。但是，随着同盟会的日渐壮大及中国革命势头的发展，黑龙会逐渐感到革命派正脱离其掌控范围，因而在积极参与革命的同时他们也暗中采取了不少破坏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内田良平和北一辉借与孙中山、宋教仁的亲密关系获取了大量革命情报，以此积极为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建言献策。此外，他们还在同盟会中频频制造矛盾和冲突，引发了革命派内部的反孙风潮，最终导致同盟会四分五裂。^④经过这几次风波，宫崎滔天也终于看清黑龙会的真实意图，因而从未加入黑龙会，与内田、北一辉等人也在此后分道扬镳。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亚洲主义”以压倒性趋势取代其他思潮成为日本政治理论的主流。由此，黑龙会也彻底撕开了其“伪善”的一面，他们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在民间广而宣传“大亚细亚主义”，将扩张

^① 龟太郎. 三国干涉以后[M]. 东京: 伝統と現代社, 1977: 10.

^② 龟太郎. 三国干涉以后[M]. 东京: 伝統と現代社, 1977: 12.

^③ 崛幸雄. 右翼词典[M]. 东京: 岩波書店, 1990: 17.

^④ 吴限. 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77-185.

国权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北洋政府期间，黑龙会积极策划张勋复辟，冒充穆斯林在甘肃图谋分裂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黑龙会又频繁组织浪人制造事端，煽动溥仪与日本合作，为九·一八事变创造条件。^①在其长达五十年的历史中，黑龙会发挥了日本权力中枢都无法取代的作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进入二三十年代后，黑龙会的指导思想又对日本右翼团体的法西斯化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它孳生出了犹存社、行地社、血盟团、大日本生产党等一系列法西斯团体，是近代日本右翼势力的母体和摇篮。^②

黑龙会掀起的“国权主义”行动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而它的成立也标志着以“大亚细亚主义”为使命右翼团体的正式出现。^③此后，亚洲主义组织朝着以军国主义、国家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组织一路右倾狂泻，它结合政界极端右翼势力及军部分子充当着日本对外扩张政策中的“急先锋”，一步步将日本推向各亚洲国家的对立面。

第二节 宫崎滔天亚洲连带行动的困境

尽管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充斥着形态各异的侵略型亚洲主义，但仍存在着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反战型亚洲主义。^④当原属同盟会的部分日籍成员对中国表露出侵略与扩张野心之时，作为中国革命坚强后盾的宫崎滔天依旧立场坚定，舍身支持中国革命。正如他在《三十三年之梦》所述：“日本应与中国革命派共患难。尽管此时革命前路未卜，多次失败，但也不应轻易言弃。”^⑤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宫崎滔天随即参与了由头山满（1885-1944）^⑥等人组织的援华团体“有邻会”，负责办理沪宁地区有邻会成员与中国革命军的联络问题，并同时随该会前往中国亲自支援革命。^⑦此外，宫崎滔天也以个人名

^① 王希亮. 近代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日本谋报活动述评[J]. 西伯利亚研究, 2003 (30).

^② 桐声. 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J]. 日本学刊, 2005 (6).

^③ 桐声. 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J]. 日本学刊, 2005 (6).

^④ 陈毅立. 近代日本的和平反战思想—以宫崎滔天与石桥湛山的比较为中心[J]. 日本问题研究, 2014 (3): 53.

^⑤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46.

^⑥ 头山满（1885-1944）：生于日本，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提倡者。头山满也是日本在20世纪初右翼政治领袖、军商，以及黑龙会创办人之一。早年与孙中山、金玉均等东亚的有志改革者颇为“友好”，曾“支持”革命党建立中华民国。

^⑦ 王俊彦. 日本侵华纪实系列·浪人与孙中山[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 1994: 135.

义为中国革命人寻求经济援助。从1911年10月起,为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宫崎滔天辗转于日本商界,向当时规模日本第一的三井物产筹集借款。期间,三井物产试图以大冶铁矿山开采权为条件换得对华经济援助,但这一想法被滔天当场拒绝。12月1日,宫崎滔天又出访上海参与了日本政府的借款活动。在艰难的谈判下,终于为中国革命筹得300万日元借款,为革命派减轻了军费不足的压力。^①

后来,随着南北议和及孙中山在中国的失势,“有邻会”其他日籍成员对革命派态度日趋冷淡,宣布纷纷脱离中国革命,并在此后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蔑华言论。尤其是当时与宋教仁、孙中山交情颇深的内田良平、北一辉二人。革命失败后,内田良平便积极参与“满蒙独立”活动,著书《支那改造论》和《支那革命调停案》,在书中污蔑“中国早已是衰亡腐朽的被奴役之国,中国人更是有着劣根性的堕落民族”。^②而北一辉更是投身“超国家主义”,在其著作《支那革命外史》中对中国革命大放厥词,贬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宣扬日本专制式“东洋共和”,进而炮制出一套法西斯化的独裁政治构想。^③

但是,作为中国革命挚友的宫崎滔天却一直坚定地站在革命党人身后,即便是革命失败也对此抱以同情与理解。1912年4月南北议和,孙中山将临时总统一职移交袁世凯。宫崎滔天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对袁世凯的邀请嗤之以鼻地说“即使渴了也不喝盗贼赠予的水。”^④但当南北妥协成为既定事实时,宫崎滔天还是站在理解孙、黄的立场上,予以二人宽慰和同情:“以民国现下的状况是不允许内乱的,也许妥协算是这国家存亡之秋最好的办法了。不管是从民国的立国现状,还是其正面临的外患,南北妥协必定也是大势所趋。”^⑤在宫崎滔天看来,中国革命只是暂时遭遇了困难,他对孙中山等革命派乃至“亚洲联合”仍然抱以真诚的期待。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内乱下正蠢蠢欲动的日本政府,不同于北一辉、内田二人的煽动鼓噪,宫崎滔天对日本的扩张政策也是极为反感,他坚信“亚细亚连带”才是正确的道路。在同年寄予革命党人的信函中,宫崎滔天愤怒地指责道:“日本如果还不(从侵略扩张中)清醒的话,日后就不可能再有亚洲的事情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706.

^② 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 内田良平関係文書[M]. 东京: 芙蓉書房, 1994: 11.

^③ 北一輝. 北一輝著作集. 支那革命外史[M]. 东京: みすず書房: 1959: 20.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497.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497.

了。”^①从宫崎滔天为了“东洋民族”和“亚洲”而警告日本的样子，仍然可以窥见他一心援助革命，慷慨无私的亚洲主义者形象。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授孙中山之意，宫崎滔天代表革命党人与日本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会谈。在会谈中宫崎滔天向长谷川提出以“满洲让渡”^②为条件日本军部派出两个师团协助中国革命的要求，但立即遭到了日本军部的拒绝。事后，宫崎滔天忿忿不平地斥责道：“此人短见狭量，冥顽不灵，军部有此将帅实在让人为东洋各民族的未来感到忧心。”^③随后，宫崎滔天和山田纯三郎又联络到日本三井物产支店长森恪，同其达成森恪提案，即以“满洲让渡”为交换条件日方向革命军提供两个师团武器和现金两千万圆。不过，这次斡旋因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反对也没有办成。^④

至此，在经历经济借款的挫折后，宫崎滔天与日本军部的两次联络也均以失败告终。在同年寄予妻子的信中，宫崎滔天无奈地感慨：“我已亲身力行了二十年才对中国的改造尽了一些微薄之力，也为日本对华的政策奉献了自己力量，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有些无力”。^⑤显然，在寻求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接连受挫后，面对日趋冷淡的中日关系及进退两难的中国革命，宫崎滔天日感力不从心。在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的背道而驰下，宫崎滔天也逐步认识到，以日本人身身份参与中国的革命事务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是不切实际的。在此后寄予友人的信中，宫崎滔天甚至称作为日本人的自己在中国是“无用之物”。^⑥而倍感无力的滔天也在信末提到将会“重新考虑自己所处的位置”。^⑦自此，宫崎滔天开始转变思路，暂停了“支那革命主义”的相关活动，转而将目光投向母国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当前的中日关系及日本的内政外交，并由此提出了以批判日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93.

^② 在会谈之前，孙中山就曾授意滔天“满洲让渡”事宜，即以“满洲特权委于日本换得其对南方派的支援”。1910年后，孙中山曾屡次在与宫崎滔天的笔谈中提到“满洲让渡”一事：“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参见：陈旭麓、郝盛潮. 孙中山集外集[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60-498.）

^③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496.

^④ 按照日本军部扩张分子的观点，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曾是日本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理应享有一切‘合法正当’权益，无须以金钱收买”。（参见：杨天石. 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后史事发微[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2.）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404.

^⑥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49.

^⑦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405.

本为中心的“对日改造观”。

虽然，自辛亥革命以来，宫崎滔天的亚洲连带行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面对日本军部的诱惑和同僚的纷纷倒戈，宫崎滔天依然坚定地站在“亚细亚连带”的思想阵营，从未背弃中国革命。在此期间，不论是向日方游说资金借贷还是寻求军事援助，以日本人身份活动的宫崎滔天始终有利可乘。但正如他所唾弃的那般：“使用玩弄权术的力量来截断利益，我排斥像这样的侵略、剥削和蹂躏人权的。”^①是故，在一心追求“亚细亚连带”的道路上，虽屡次经历失败和坎坷，但宫崎滔天仍然不愧为一个积极且正面的亚洲主义者形象。

第三节 宫崎滔天亚洲主义思想的调整

一战以来，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支那革命主义”被淡化，“日本改造论”成了其主要的活动理念。其次是受到“和平主义浪潮”和“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影响，宫崎滔天开始背离亚洲主义，转而崇尚国际联盟，但不久后他又重新回归亚洲主义，对这一思想作了新的补充和发展。

一、“对日改造观”的萌发及主要内容

经历中国革命事业的失败后，宫崎滔天开始将视野转向日本。这一时期的滔天先是试图以政治家的身份跻身日本政府内部，但在1915年的众议院竞选中滔天遗憾落选。竞选失败后的滔天多少认识到了日本国内的情况。在《巨烟往事》中，他如是分析：“自称发达国家的日本实际是落后、腐败的”，因为日本存在“顽固分子流”。^②因此，宫崎滔天提出“日本要想革新就必须对当前的政治状况进行‘改造’”。^③这也是滔天第一次提到“对日改造”的概念。不过，与“支那革命主义”一样，滔天的“日本改造观”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一战期间，宫崎滔天在《海日日新闻》留下了大量时评，包括《东京通讯》、《炉边琐谈》和《荒唐日记》等重要内容，其间谈到了日本内政外交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在《东京通信》一文中，宫崎滔天站在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497.

^② 宫崎滔天. 巨烟より.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45.

^③ 宫崎滔天. 巨烟より.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46.

人民的立场上，对一战期间日本的军备扩张提出了批判，指出这实际是对本国国民的一种双重压迫：“举国民为兵，举国库扩军的行为无疑会给国民带来巨大负担。而且这种负担是包括劳动上人力、兵力和经济上课税的双重负担”，“军备投入是无止境的，人民永远都要替政府还债”^①，“军备扩张对国民生活来说已是火与水也”。^②此外，宫崎滔天也从被侵略国中国的立场出发，将矛头直指日本的军备扩张，直言“阻碍中华民国成立的就是日本”，^③而侵略政策将成为“日本政府犯下的根本性的错误”，^④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达到了高潮”。^⑤在这一时期的时评中，宫崎滔天毫不避讳地把对军国主义的愤怒倾泻到笔端，以警告和批判的方式宣扬自己“亚细亚连带”论者的立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当看到过去的俄国放弃侵略主义，积极对外交往时，宫崎滔天仿佛在黑暗中窥见光明。他以苏俄否定侵略主义为榜样，对日本发出了规劝，希冀日本改变军国主义外交和侵略主义政策：“就新露西亚绝对否定和放弃侵略主义的前车之鉴来说，这实是日本转变当下军国主义政策的最好机会。”^⑥同时，他还一语破的地指出日本所缺并非军备，而是思想上的贫乏：“我国之忧，不在兵力的不足，而在思想的贫乏，是无哲学宗教之咎，是沉溺于盲目忠君爱国思想之咎也。”^⑦不过，因政治势力的单薄宫崎滔天无力对此做出积极应变，只能以舆论为武器不断抨击日本的军国主义，规劝日本改弦更张。但是，在这之中，作为日本人的宫崎滔天能够清楚地洞悉侵略主义带来的利益本质，并对国民和受害国的不幸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这一点实为难能可贵。

其次，是对政府的批判及改造。在这一时期的时评中，宫崎滔天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日本政府展开批判。其一，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荒唐日记》中，宫崎滔天直言日本的外交是“低脑外交、盲目外交”。^⑧滔天提到，不管是大隈内阁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还是寺内内阁对中国段祺瑞军阀援北主义对华政策，都是“不人道且粗暴的做法”，是像“商人一样自私自利的政策。”^⑨与

① 宫崎滔天. 东京通信.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8.

② 宫崎滔天. 东京通信.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55—256.

③ 宫崎滔天. 炉边で話をする.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47.

④ 宫崎滔天. 炉边で話をする.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47.

⑤ 宫崎滔天. 炉边で話をする.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45.

⑥ 宫崎滔天. あきれ日記.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62.

⑦ 宫崎滔天. 东京通信.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18.

⑧ 宫崎滔天. あきれ日記.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22.

⑨ 宫崎滔天. 广东行.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588.

此同时，宫崎滔天也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对现下中国的“排日运动”表示理解：“我们国家的政府实行了愚蠢的外交政策，导致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化为泡影。所以，排日运动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没有失去国家的国民还要甘愿受辱的道理。”^①在滔天看来，中国与日本的疏离是日本政府的咎由自取，其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终将走向失败。此外，宫崎滔天也批判现任政府的顽不灵，指责其：“虽是现在的政党，现在的政治家，但所主张全是过去的东西。邻国中国经过革命已经建立了共和国，而日本还顽固地不更新旧的看法和做法，把中国当作保护国在亚洲与欧美列强争夺。”^②不难看出，虽是对日本政府提出批判，但宫崎滔天的立场和叙述主体仍然是中国，其思想内核中亚细亚连带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只不过是将对“支那革命”的一腔热忱转变为了“对日批判”的表现形式。

在抨击日本政府的同时，宫崎滔天也对改造政府提出了相应主张。对于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滔天指出日本应有的姿态是“解放朝鲜，解放台湾”，进而“实现日支亲善之实”，最后“团结诸弱国，建立平等组织以对抗白人。”^③再者，对于政府结构，宫崎滔天指出其改造重点在于废除军阀和元老的治疗。不过，由谁、如何来推翻军阀主导的政治体系呢？对此，滔天首先寄希望于日本国内能够实行普选。在他看来，普选不单是推翻藩阀官僚的直接手段，还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环节。^④同时，宫崎滔天也寄希望于日中两国的国民，尤其是民间的有识之士。宫崎滔天向来看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志士，对他们给予“成就革命，号令宇内，弘道万邦”的厚望。^⑤同样，在“对日改造观”中，他也再度表达了这一想法，希望“支那革命青年在民间呼以百应，将公道正义弘扬天下”。^⑥在对日本政府的规劝中，宫崎滔天渴望实现“亚细亚连带”的宿愿再次跃然纸上，其思想中“博爱平等”的内核亦呼之欲出。但是，随着日本政府朝着“大陆政策”的不断倾斜，日本国内的社会环境也变得愈加恶劣，接连不断的思想镇压笼罩在这群激进知识分子间，宫崎滔天的想法也只能变成一纸空文。因而，面对不断走

^① 宫崎滔天. 广东行.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589.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93.

^③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28.

^④ 针生清人. 宫崎滔天の支那革命の思想[J]. 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1978（3）：14.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123.

^⑥ 宫崎滔天. 广东行.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55.

向侵略与扩张狭路的日本政府,到后来宫崎滔天也只能发出一些无奈的感慨:“愚蠢的我国当局无论如何努力阻止之,反对之声都是不可抗拒的”^①,“日本是容不下理想之国也,不允许研究道理之国”。^②

最后,对日本平民的批判和改造。自甲午战后,反政府反侵略的主张便成了宫崎滔天区别于其他大陆浪人的鲜明特色,一直以来宫崎滔天也都以此为坚定立场。但是,一战以后对日本平民也展开批判却是宫崎滔天过去思想主张中前所未有的。本来,宫崎滔天对普通民众是抱以同情和理解的。受到大哥宫崎民藏的影响,滔天早年便加入了以实现“土地平均主义”为理想的土地复权同志会,致力于土地改革运动和为农民谋福利。然而,对于那些鼓吹战争、恃强凌弱的平民,宫崎滔天显然无法沉默。尤其是看到过去的老师和旧友开始鼓吹军国主义,成了孤注一掷的“民权论者”,宫崎滔天感到痛心疾首。因而,在这一现状的触动下,宫崎滔天在时评中对日本平民展开了猛烈批判。对于那些蔑视贬低中国人的日本平民,滔天直言他们是欺软怕硬的“精神残疾者”：“日本租户一边上涨着中国人的房租,一边把他们当做‘吝啬鬼’,但同时又害怕白人,大概日本人的宿疾就是欺软怕硬吧”^③,“彼等通常用毛唐呼白人,腔阔罗呼支那人,面对白人却卑躬屈膝,对支那人却待如奴婢。于强者逞强,遇弱者示弱。每每思于此事,痛叹不堪矣。”^④

同时,宫崎滔天也指责平民们不关心政治,没有政治觉悟性:“归根结底,国民自身觉悟不足,这是国民的错,是用钱出卖选举权的国民的错。”^⑤在宫崎滔天看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却是“伪君主立宪制”。^⑥自由民权运动虽引入了天赋人权、民主平等等观念,但平民却缺乏对选举、立宪、议会等基本政治常识的认识。因此,他感慨道:“很难说这样的政治体制对于国民到底有怎样的影响,也许反而使得国家主义色彩更加浓厚。”^⑦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实现真正的民智启蒙呢?宫崎滔天认为,实现启蒙之重任在于中日两国民间的有志之士。他寄希望于中日两国青年,希望他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133.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三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304.

^③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7.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41.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10.

^⑥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 平凡社, 1971—1976: 497.

^⑦ 加藤陽子. 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M]. 东京: 講談社, 2002: 25-27.

们“上书请愿迫使日本放弃现行的扩张政策”，甚至亦可直接诉诸“武力将政府取而代之”。^①显然，在对平民的批判中，依然流露的是宫崎滔天对日本扩张政策的反感和愤怒。他希冀以真正的民智启蒙实现人权和民权的恢复，让日本重回“亚细亚连带”的道路。

一战以后，面对已然步入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回归母国的宫崎滔天深感不安。在对现状的反思和前途的担忧中，宫崎滔天对日本展开了全面批判。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滔天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对日本提出了批判和改造。首先，滔天认为日本军阀应停止军备扩张，改变军国主义方针。其次，滔天指出日本政府要调整外交政策，实现真正的中日亲善。最后，滔天希望唤醒日本国民的政治觉悟，彻底启发民智以争取自由民主。虽在宫崎滔天的批判中日本是主要对象，但在其间仍可窥见他对中日关系及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宫崎滔天“亚细亚连带论”者的形象依然清晰可见。只不过，这一时期他的重心不再是中国革命，而改为了对日本的批判和改造。

二、对亚洲主义的脱离与复归

一战期间，宫崎滔天的亚洲连带思想以“对日改造观”为主要表现形式。但这之后，他的亚洲主义立场又呈现出相对矛盾的状态。这一时期，他先是推崇威尔逊的“十四条原则”，后又沉迷战后“和平主义”浪潮，开始脱离亚洲联合这一主题，并在之中对中国革命有过错误定论。但是，在看到国际联盟的虚伪和“和平主义”的病态发展以后，宫崎滔天又重新回归了亚洲主义的道路，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一战以后，回归母国的宫崎滔天也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这一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为尽快结束大战，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宫崎滔天对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大加称赞，认为其中的“国家联合”、“世界改造”、“和平主义”等主张“是当前形势下最恰当的答案”。^②对此，他呼吁日本“主动跟随大战后世界的大势”，因为现在已是“舞台一变由亚洲转向世界的时候了”。^③与此同时，在战后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欧洲侵略主义已经衰退，世界正朝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500.

^②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588.

^③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29.

前所未有“和平”大步迈进的想法在日本社会蔓延开来。受到这种病态式“和平主义”浪潮及威尔逊“国际联盟”的影响，宫崎滔天也错误地认为侵略主义已经退潮，在和平主义的迅猛发展下亚洲联合甚至主张亚洲主义已经没有必要。因而，这一时期的滔天开始对“亚洲联合”产生怀疑，甚至萌生脱离和放弃“亚洲主义”的想法。在寄予《上海日日新闻》的时评中，宫崎滔天写下“继承和发扬泛亚细亚主义的做法是愚蠢至极也”^①，“从中国革命走向亚洲乃至世界的设想只是浮夸臆想罢”^②这类彻底否定亚洲主义的话语。由此看来，亚洲主义已经在滔天的印象里成为了一种负面主张。正如嵯峨隆所指：“这时的滔天认为欧洲的侵略主义已经衰退，所以这一思想对立面的亚洲主义已不可能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滔天已经脱离了原本的亚洲主义。”^③

此外，在病态式“和平主义”的追求下，宫崎滔天也对中国时局发表过一些错误看法。当时，一些欧美国家选择无视德、日两国的侵犯行为，对其关于中国山东的权益争夺一事一忍再忍，甚至打算不惜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得所谓的“和平”。受到此类偏激式和平思潮的影响，宫崎滔天开始对中国革命运动产生怀疑。他批评中国对山东的正义退还要求，错误地认为日本对山东的占有是“和平主义式的历史推进”。^④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宫崎滔天写道：“借山东问题之名泄露其他郁愤，绝不是一种聪明方法，尤其是无视日本在山东的作用。这种不归还就是独占的想法是像虫子似的简单思维。这种行为像是撒娇的孩子既不像话又不听话。”^⑤显然，身处历史洪流的宫崎滔天没能敏锐地察觉到西方所盛行的“和平主义”实则是将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因而更没能意识到在对和平的偏执中自己已经徘徊在民族主义的边缘。

其实，这一时期的宫崎滔天之所以对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世界“和平主义”浪潮深信不疑，与滔天当时的身体状况也有着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以来，宫崎滔天接连患病。1918年中期，滔天还被医生诊断为严重的肾脏病，并被下达戒酒、休养的指示。正如渡边所指：“滔天的身体每况愈下，这是在考虑他思想

^①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1.

^② 初瀬龍平. 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M]. 北九州：北九州大学法学会，1980：58.

^③ 嵯峨隆. 宫崎滔天とアジア主義[J]. 国際関係. 比較文化研究，2016（3）：142.

^④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329.

^⑤ 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东京：平凡社，1971—1976：225-226.

出现迁移时不能忘记的事实。”^①当时，宫崎滔天自己也声称因为身体的原因，对凡事都患上了“悲观病”，几乎是“用绝望的眼光来看待时事推移”。^②对于这样的滔天来说，希望般的存在正是战后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及当时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潮。因而，宫崎滔天才在思想上萌生了脱离亚洲，转向国联的想法。

不过，伴随着宫崎滔天对国际联盟和威尔逊期待的幻灭，他还是重新回到了亚洲主义的道路上。战后，威尔逊虽然对取消种族歧视的提议表示同情，但最终却采取了“将反对者的口实加以否决的态度”，宫崎滔天对此失望地断定他为“腹黑政治家”。^③而此时的滔天也幡然醒悟，感叹这样的政治家所提倡的“正义人道”和日本军阀所提出的“日支亲善”一样，都仅仅只是空名而已。为此，宫崎滔天自省自己有“拘泥于和平，高估国际联盟之嫌”，并尖锐地指出像国联这样的主张不过是“夸大妄想而已”。^④由此，宫崎滔天也彻底放弃了国际联盟的道路，再度回归到亚洲主义的道路上，并重新在“亚洲联合”的基础上对日本的发展前景展开构想。

宫崎滔天指出，在欧美列强已接连失去信用的现状下，不论是继续推行“国家主义”，还是退而与“列国保持协调”都是饮鸩止渴的做法。^⑤因而，在进退两难的现实下，宫崎滔天认为当前日本真正的姿态应该是“成为以彻底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亚洲联盟主唱者”，而这也是“拯救脱离国联后日本被孤立的唯一方法”。^⑥此外，宫崎滔天还特别强调，所谓“彻底的人道主义”需要日本放弃现行的“军国主义式外交”，在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中“行亲善之实”。对此，日本政府要先“解放朝鲜，解放台湾，改变对中国的外交”，尔后再“于平等组织下组织联邦”。^⑦不过，滔天也再度重申这一联邦并不是以日本为中心，而是在“给予各弱国自由自决”之上的平等组织。^⑧显然，经历了国际联盟的失败后，宫崎滔天又重新回到了亚洲主义的道路上。不过，经历短暂调整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内涵也更

^① 渡辺京二. 評伝宮崎滔天[M]. 東京：大和書房，1976：256.

^② 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平凡社，1971—1976：128.

^③ 嵯峨隆. 宮崎滔天とアジア主義[J]. 国際関係. 比較文化研究，2016（3）：144—145.

^④ 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平凡社，1971—1976：253.

^⑤ 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平凡社，1971—1976：254.

^⑥ 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平凡社，1971—1976：172.

^⑦ 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平凡社，1971—1976：128.

^⑧ 宮崎滔天. 宮崎滔天全集第二卷[M]. 東京：平凡社，1971—1976：128.

加丰富,它既提倡以真正的人道正义为基础,又给予各弱国自由自决权利。可以说,它是宫崎滔天继“支那革命主义”、“对日改造观”后亚洲连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与此同时,回归亚洲主义道路的宫崎滔天也开始密切关注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并对这一时期日本的民主运动、中国的国民大革命抱以了很高期待。当时,吉野造作在民本主义理念下提出了“打倒藩阀”,联合“和平支那”与“和平日本”、“推动普选”的口号,在大正年间(1905—1925)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主义运动。身患重病的宫崎滔天虽没有投身于这场运动的一线,但是仍对民主运动中的“米骚动”、“佃农斗争”、“政治普选”事件给予了极大关心,甚至抱有一种“如果不促进这场社会改革的话,日本就要灭亡”的强烈危机感。^①而滔天的长子龙介也开始作为“新人会”成员活跃在民主运动的政治舞台,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概也是对期待“改造日本、促进亚洲联合”父亲志向的一种继承。此外,这一时期的宫崎滔天也依然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尤其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1920年—1922年),在身患重病的艰难情形下,宫崎滔天亲自到访广州在引介日商开发广东实业,与日资台湾银行交涉借款等活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②过去,学界对一战以后宫崎滔天的思想变化着墨甚少,在部分研究中甚至将其直接看作是对亚洲主义的完全背离和退却。然而,这一时期宫崎滔天的思想只是在历史的洪流中经历了适时的调整,在对亚洲主义短暂质疑后滔天还是回到了“亚细亚连带”的正确道路。因而,对一战以后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不应予以完全否定的眼光,而应于批判分析中对其思想进行再定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伴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确立,中日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中日联合的思想根基也变得愈加薄弱,由此严重削弱了亚洲连带的现实性。与此同时,宫崎滔天的“亚细亚连带”思想也经历了转变和调整。在此期间,他先是提出了“对日改造观”这一具有批判性的学说,不再像“支那革命主义”那样强调“中日提携和连带”,转而将重心放在中日两国解决本国问题,为此后的友好关系铺路的基础上。随后,在“和平主义浪潮”和“国际联盟”的影响下,亚洲主义话语逐渐失去魅力,变成了空洞乏力的口号。此时的宫崎滔天也开始对

^① 野村浩一著 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66.

^② 杨天石、狭间直树.何天炯与孙中山—宫崎滔天家藏书札研究[J].历史研究,1987(5):33.

亚洲主义产生怀疑，甚至有过对中国革命运动的错误解读。但是，在揭开“国际联盟”的虚伪和看穿“和平主义”的病态后，宫崎滔天又重新回到了亚洲主义的道路，在反思和自省下对此作了新的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具现实意义的亚洲联合思想。而这一联合思想中亚洲“民族平等协作”和“民族自决”的主张不仅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强化的历史环境中显得弥足珍贵，并且于强调区域合作和深化中日关系的今日来看亦是熠熠生辉。

结语

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启蒙于兄长弥藏，受到自由民权之家的耳濡目染及宗教宽容思想的影响，在早期亚细亚连带机运的促成下逐步成形。因而，不同于其他亚洲主义者，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便在滔天的思想坐标轴上勾勒出了“中日提携”、“民族平等”的原点。甲午战后，当亚洲主义由“连带”向“侵略”不断逆转之时，不同于其他大陆浪人的异变，宫崎滔天却真诚地守护着“亚细亚连带”的心愿，以赤诚之心与中国革命同行，在与时代的激烈交锋中宫崎滔天的思想展现出了很强的一贯性。一战以后，在亚洲主义彻底异化和东亚关系日趋冷淡之际，宫崎滔天的“亚细亚连带”思想由过去激进浪漫的“支那革命主义”转为了保守温和的“对日改造观”，并在对亚洲主义的脱离和复归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主张“民族平等协作”和“民族自决”这一更具现实意义的亚洲联合论。

纵观宫崎滔天五十余年的人生轨迹，其长达一半的生命历程都贡献给了中国革命。如此胸怀广阔的豪杰之士不仅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亦是罕见。就连革命伟人孙中山都盛赞其：“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①但是，滔天的亚洲主义多少带有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不管是对中国还是日本他都抱有过高幻想，而关乎革命进程的许多问题在滔天的阐释中也未见任何客观分析的迹象。比如，如何保证中国革命会波及整个亚洲并改变世界？如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以日本人身份排除母国障碍？对此，滔天并没有完整和可行性的对应方案。可以说，宫崎滔天的“支那革命主义”以及后来的“对日改造观”既没有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具体的实践纲领，只是依靠宫崎滔天的日记和笔谈能依稀概括出大体轮廓。正如赵军所言：“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只是以战略的综合眼光分析了亚洲各国情况后的一种基本估计和设想。”^②但总的来说，宫崎滔天的思想仍然是亚细亚之流中最积极且正面的部分，他完整地延续了早期亚洲主义连带思想，并在侵略型亚洲主义肆虐的逆流中保持了很强的一贯性。

回到2021年的当下，自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不仅牵动着全国亿万

^①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3.

^② 赵军. 试论宫崎滔天与“支那革命主义”[J].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C]. 1981: 670.

普通民众的心，更引来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周边国家的纷纷援助。在中国疫情爆发之初日本便送来了“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问候，而当日本陷入疫情危机时我们亦抱之以“青山一道，风雨同担”，中日关系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劫难中迅速回温，朝着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方向稳定前行。因而，在中日关系稳步推进的当下重提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思想”也就更具有了现实意义。尤其是在亚洲主义急遽右转之时宫崎滔天却依旧坚守在“亚细亚连带”的思想阵营，而其思想中所蕴涵的“中日提携”、“民族平等”特质在今天看来亦是弥足珍贵。是故，在宫崎滔天“亚细亚连带”思想和精神的启发下，步入后疫情时代的当下，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应抓住亚洲区域主义回潮这一历史机遇，共同推进亚洲的区域化进程和一体化建设，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谋求更加稳定和持续友好的中日关系。

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一）著作（含译著）

- [1] 王屏.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2] 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 [3] 杨栋梁.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1895-1945[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
- [4] 赵金钰. 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5] 王俊彦. 日本侵华纪实系列·浪人与孙中山[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 1994.
- [6] 刘家鑫. 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 [7] 孙立祥.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
- [8] 陈旭麓、郝盛潮. 孙中山集外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9] 杨天石. 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革命后史事发微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10] 崔丕.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11] 沈予. 日本大陆政策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2] 葛兆光. 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3] 吴限. 日本明治时期的右翼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14] 宫崎滔天著 林启彦译. 三十三年之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狭间直树著、张雯译. 日本早期的亚细亚主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二）期刊论文

- [1] 盛邦和. 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J]. 历史研究, 2005 (3) .
- [2] 戚其章. 日本大亚洲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J]. 历史研究, 2004 (3) .
- [3] 杨栋梁 王美平. 日本“早期亚洲主义”思潮辨析——兼与盛邦和、戚其章先生商榷[J]. 日本学刊, 2009 (3) .

- [4] 刘峰. 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发展与概念定型 [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6 (4) .
- [5] 潘吉玲. 亚细亚主义的逻辑和伦理[J]. 日本研究, 2005 (4) .
- [6] 葛兆光.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3) .
- [7] 韩东育. 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 (1592-1945)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 (4) .
- [8] 王向远. 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 [J]. 华侨大学学报, 2005 (2) .
- [9] 赵军. 宫崎滔天与兴中会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2 (5) .
- [10] 赵军. 试论宫崎滔天与“支那革命主义” [J].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 [C]. 1981.
- [11] 李长莉. 何天炯与同盟会东京本部 [J]. 近代史研究, 2012 (3) .
- [12] 李长莉. 从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看孙中山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对日关系 [J]. 近代史研究, 2020 (1) .
- [13] 刘福祥 赵矢元. 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改良两派之交恶 [J]. 历史教学, 1988 (2) .
- [14] 章开沅. 百年以后看同盟会 [J]. 四川大学学报, 2006 (4) .
- [15] 阮斐娜着、刘超译. 文士、浪人、说唱传统及近代中日间的文化互动: 以宫崎滔天爲个案 [J].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 2014(10).
- [16] 王希亮. 近代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日本谋报活动述评[J]. 西伯利亚研究, 2003 (30) .
- [17] 桐声. 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J]. 日本学刊, 2005 (6) .
- [18] 王晓秋. 《革命评论》与同盟会 [J]. 北大史学, 1999 (3) .
- [19] 周一良.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日本——兼论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的关系 [J]. 历史研究, 1981(4).
- [20] 刘峰. 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与“亚洲主义”——以大正时期为中心的考察[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9 (5) .
- [21] 刘峰 田波. 日本大正末期的“亚洲主义”浪潮与中国的回应——兼论孙中山的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J]. 世界历史评论, 2020 (2) .

- [22]徐倩.日本明治中期国粹主义思潮中的亚洲观变迁——以政教社机关杂志《日本人》为中心[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9(6).
- [23]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编辑组.辛亥革命资料丛刊[A].北京:中华书局,1982.

二、日文部分

(一) 著作

- [1] 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全集第一——五卷[M].東京:平凡社,1971—1976.
- [2] 小寺謙吉.大亜細亜主義論[M].東京:宝文館,1916.
- [3] 松本健一.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M].東京:岩波書店,2000.
- [4] 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内田良平関係文書[M].東京:芙蓉書房,1994.
- [5] 北一輝.北一輝著作集.支那革命外史[M].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
- [6] 古屋哲夫.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M].東京:緑蔭書房,1996.
- [7] 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
- [8] 渡辺京二.評伝宮崎滔天[M].東京:大和書房,1976.
- [9] 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伝[M].東京:葦書房,1984.
- [10] 模本泰子.宮崎滔天[M].東京:ミレルウ書房,2013.
- [11] 近藤秀樹.宮崎滔天 北一輝[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
- [12] 初瀬竜平.伝統的右翼内田良平の研究[M].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80.
- [13] 亀太郎.三国干渉以后[M].東京:伝統と現代社,1977.
- [14] 崛幸雄.右翼词典[M].東京:岩波書店,1990.
- [15] 加藤陽子.戦争の日本近現代史[M].東京:講談社,2002.
- [16] 曾根俊虎.清國漫遊記[M].東京:續文舎,1883.

(二) 期刊论文

- [1] 本山幸彦.明治前半期におけるアジア観の諸相[J].人文学報 1970(3).
- [2] 杉浦明平.江戸末期知識人のアジア観[J].群像,1972(12).
- [3] 衛藤沈吉.滔天と清国革命はどうして結びついたか[J].思想,1968(2).
- [4] 容應莫.明治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国——なぜ明治人は活躍の舞台を中国大陆に求めたか[J].アジア研究所紀要,1994(21).
- [5] 太田雅夫.浪漫的革命観の挫折——宮崎滔天と「革命評論」[J].展望,1972

(3) .

[6] 北川純子. 宮崎滔天による浪花節台本『天草四郎』をめぐって[J]. 大阪大学紀要, 2015 (2) .

[7] 武田清子. アジアの革新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孫文と宮崎滔天[J]. 国際基督教大学学報, 1974 (17) .

[8] 初瀬龍平. アジア主義と国際システム——宮崎滔天の場合[J](この論文は安倍博純・岩松繁俊編集した『日本の近代化を問う』に収録されている. 東京: 勁草書房, 1982)

[9] 薮田健一郎. 宮崎滔天の『アジア主義』と第一次世界大戦後の世界思潮[J]. 同志社法学, 1996 (48) .

[10] 上村希美雄. 裏返しの明治を生きる——若い滔天の思想形成 [J] . 宮崎滔天全集月報, 1976(2) .

[11] 久保田文次. 辛亥革命における孫文、宋教仁——中国同盟会崩壊過程 [J] . 歴史学研究, 1974. (8)

[12] 深町英夫. 近代日本のアジア主義を振り返る [J] . 東方, 2013 (12) .

[13] サストル・グレゴワール. 大陸浪人とアジア主義——宮崎滔天を例として[J]. フランス共同ゼミ, 2009(3) .

[14] 針生清人. 宮崎滔天の“支那革命”の思想 [J] . 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 1978 (13) .

[15] 山口光朔. 宮崎滔天アジア主義——大陸浪人の一種類 [J] . 桃山学院大学紀要, 1963 (2) .

[16] 嵯峨隆. 宮崎滔天とアジア主義 [J] . 国際関係. 比較文化研究, 2016 (3) .

[17] 松田宏一郎. 『亜細亜』の『他称』性——アジア主義以前のアジア[J]. 日本政治学会年報, 1998 (2) .

[18] 黒木彬文. 興亜会のアジア主義 [J] . 法学研究, 2005 (3) .

[19] 刘峰. 一九一〇年代後半期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展開 [J]. 千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2 (5) .

[20] 赵军. 近代日本と中国の一接点——大陸浪人、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国の関係を中心として[J]. 駒沢女子大学研究紀要, 1995 (2) .

[21] 沈建国. アジア主義再考——宮崎滔天を中心に [J]. 日本学研究, 2003(3).

[22] 何鵬举. 革命から改造へ: 宮崎滔天の夢と中国 [J]. 日本研究, 2016(3).

三、英文部分

(一) 期刊论文

[1] Chih-yu Shih. A Rising Unknown: Rediscovering China in Japan's East Asia [J]. *China Review*, 2011(11).

[2] Danile Leese. "Revolution":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J]. *Oriens Extremus*, 2012(51).

[3] Masaru Ikei. Japan's Respons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66(25).

[4] Rebecca E. Karl. Creating Asia: China in the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8(10).

[5] W. Puck Brecher. Eccentricity as Ideology: Biographies of Meiji "Kijin" [J].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10(10).

附录

《革命评论》宫崎滔天等人刊载的部分重要文章^①

刊行年号	发行文章及作者
1906.9.5 明治三十九年	①宫崎寅藏：《发行辞》、《中国留学生》 ②《民报》纲领
1906.9.20	①宫崎寅藏：《中国留学生的责任》、《中国立宪问题》 ②和田三郎：《帝王暗杀时代》、《欧洲革命大势》
1906.10.5	①宫崎寅藏：《中国革命与列国》、《美国的今昔》 ②和田三郎：《俄国革命党的使命》、《俄国暗杀事件》 ③池吉亨：《俄皇之犬》
1906.10.20	①平山周：《中国的秘密会社》 ②宫崎寅藏：《孙逸仙》、《野满后太郎及其弟留记》
1906.11.10	①平山周：《兴中会章程》
1906.11.25	①平山周：《清国的官吏社会》 ②宫崎寅藏：《落花之歌》 附：该期发行正值民报创刊一周年纪，宋教仁特在《革命评论》上供诗数首
1907.1.1 明治四十年 新年号又名为“支那革命号”	①和田三郎：《迎接革命的新年》 ②池吉亨：《清朝之陌路》 ③该期专立《中国革命殉难者小传》介绍在革命中牺牲的同盟会志士 ④萱野长知：《民报一周年纪念大会报道》、《孙中山的演讲》 ⑤作者不详：《湖南会党首领马福义介绍》
1907.1.25	①作者不详：《中国萍浏醴起义通讯》 ②平山周：《清朝排斥新学》、《张之洞的密信》 ③萱野长知：《思想界的暗斗》
1907.2.25	①池吉亨或池田三郎：《中国革命的去、现在和将来》 ②宫崎寅藏：《中国革命之大势》 ③作者不详：《中国革命之管见》 ④作者不详：《滑稽的中国立宪问题》
1907.3.25	①宫崎寅藏：《革命问答》 ②青藤幸七郎：《关于中国革命形式的报道和评论》 ③和田三郎：《天诛主义》 ④章炳麟：《邹容传》

^① 资料来源：宋庆龄基金会. 宫崎滔天家藏：来自日本的中国革命文献[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同盟会革命大事年鉴^①

明治四十年（1907），广东省黄冈（五月）、七女湖（六月）、钦州、廉州（九月），广西省镇南关（十一月）起义。

明治四一年（1908），云南省河口起义（四月）。

明治四三年（1910），广东新军起义（一月），暗杀汪兆铭、摄政王载沣失败（四月）。

明治四四年（1911），黄兴袭击两广总督衙门（黄花岗事件，四月），武昌起义（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开始，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孙中山于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九日）。

明治四五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月一日，中华民国元年）。宣统退帝位，袁世凯掌握了临时共和政府的全部权力（二月十二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接任（三月）。大正改元（七月三十日）。宋教仁等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入党。

大正二年（1913），国会选举中国国民党胜利（二月），广东、湖南、安徽、福建、四川各省独立组织军队讨袁。同年，革命党人掀起二次革命（七月）。

大正三年（1914），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七月）。

大正四年（1915），中日两国“二十一条”要求达成（一月）。上海、广东、汉口等地兴起了抵抗日货的运动（二月），袁世凯称帝（十二月）。

大正五年（1916），黄兴去世。大正八年（1919），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十月）。

大正十年（1921），孙中山在广东成立新政府，并就任非常时期大总统（五月五日）。同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七月一日）。

大正十一年（1922），宫崎滔天逝世（十二月六日）。孙中山于上海亲自举办追思会。

^① 资料来源：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编辑组.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A]. 北京：中华书局，1982.

致谢

搁笔之际，为期近半年的毕业论文写作即将告一段落，而我的学业生涯也正式步入了尾声。回首往昔，求学之甘苦，先生之教诲，同窗之情谊，乃至桃子湖畔的一草一木，咸嘉湖的一楼一字，于湖南师范大学的点点滴滴仍是历历在目。然百里长亭，终有一别。在临别之际，我也想向这一路走来给予我诸多帮助的老师、同学及家人们道一声感激！

天地之广远，惟学之艰深。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易兰。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低调务实的为人原则让我这三年来受益匪浅。犹记得预答辩前夜，导师仍在饭桌上悉心指点我的论文，为我思量明日应答对策。而每当我在生活上遇到瓶颈和对未来方向感到迷茫之时，导师也总是以高瞻远瞩的目光为我指明方向。在易兰老师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独立且智慧、温柔亦坚定的女性形象。此外，我也要特别感谢历史文化学院的曹英老师、刘雄老师，二位先生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求实探微的治学风格，不仅启发了我的论文写作，更加深了我对学术研究的敬畏。

学贵为师，亦贵得友。在此我也要感谢历史文化学院 18 级世界史的诸位同学，特别是我的室友陆美年、易凤姣、雷蕾、倪莎、郭旖妍，以及 17 级的各位师兄师姐们。平生感知己，相逢亦如故。咸嘉湖 405 背后每一晚的欢声笑语，岳麓山 309 教研室里每一次的切磋讨论，如今看来皆是这段清浅时光里弥足珍贵的回忆。感恩你们三年以来的包容与关怀，亦感恩学业路上的陪伴与相助，愿此去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同学少年！此外，亦特别感谢筑波大学李雨桃同学、厦门大学陈明月同学，二位在提供日文原文文献及台湾方面的研究成果上给予了本人莫大帮助。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最后，我要对养育我的父母及家人们道一声感激。感恩你们的辛劳付出，护我在二十余载读书生涯里无衣食之忧；亦感恩你们的理解关心，让我在成长道路上始终觉得自己被爱围绕。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外，谁言寸草心，报的父母爱。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沉淀的爱继续前行，并许以余生护你们周全。

星城季春，惠风和畅。今已到离别之际，倒觉得这平日光景亦让人十分感动。

岁月安然，不负遇见。再次感恩我爱的各位及爱我的各位，是你们让我觉得平凡的自己亦能成为熠熠生辉的存在。临了让我再抱以最诚挚的祝福，愿诸位寒暖当心，身体无恙，平安顺遂，喜乐安康！

